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私立學校或明星國中？

社會階級如何形塑家長之學校選擇

School Distinction:

How Social Class Shapes Parental School Choice

王大鯤

Wang, Ta-Kun

指導教授：張宜君 博士

Advisor: Chang, Yi-Chun, Ph. D.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January 2025

謝辭

這篇論文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 張宜君教授。從甫入學因為修習老師開設的課程而撰寫期末報告，到確定指導關係後定期討論研究計畫，每一回都從老師身上得到豐富且實用的建議。再來要感謝三位口試委員：王麗雲教授、蘇國賢教授與黃敏雄研究員。王麗雲老師對於學校選擇的豐富理解、蘇國賢老師對於論文主軸的精準建議以及黃敏雄老師對於量化研究的仔細剖析，都讓這篇論文得以更加完善。此外，這篇論文發展的過程中，曾於臺灣教育社會學論壇以及臺灣社會學年會發表，有幸並感謝能得到評論人蘇永明教授與陳建州教授的回饋。

論文寫作是段漫長的過程，我很幸運過程中有夥伴相互支持。感謝幫我閱讀論文稿件或與我討論論文內容的婷羽、茗傑、振辰、博謙與侑達，你們的回饋讓我得以理清思路與論證。感謝同門的書葳、育慈、子鋒、玥好、嘉琪與欣宜，有你們一同討論研究與生活讓我得到許多能量。感謝參與論文口試的心揚、鈺紋、妍筑、書菡、昶佑、如靜、祐萱與筑萱，你們的協助讓我在最後關卡也感到安心與暖心。還要感謝碩士兩年又半載在師大與柏克萊結識的友人們，雖沒能一一點名，但生活有你們增添許多滋味。最後更要感謝一路上陪伴我的家人以及女友，有你們相伴是我最大的福氣。

這篇論文的核心關懷源於我在雲林任教之時。那是某年的縣內辯論比賽，我帶著校內隊伍在台下觀摩，交手雙方一邊來自位於市區的知名公立國中，另一邊則來自位於海線的小型公立國中。我驚訝於兩邊學生肉眼可見的巨大差距：來自市區的學生儀表堂堂，穿著全套制服配黑皮鞋；來自海線的學生身形單薄，穿著有些破損與髒污的運動服，彷彿穿越幾十年前的時空來到現在。平心而論，我聽得出雙方都有充分的準備，許多爭點難分軒輊；但誠實地說，在兩邊學生剛站上台時，甚至還不待他們開口，我似乎就已經看得到比賽的結果了——結果也的確不出所料。同樣是公立國中，同樣的義務教育內容、同樣的低廉學費負擔，卻為何學生的組成樣態如此不同？我要感謝樟湖的人事物以及那三年的教育現場經驗，這都是我持續耕耘教育研究的養分。

王大魏

2025年1月

私立學校或明星國中？ 社會階級如何形塑家長之學校選擇

摘要

在代間流動的研究中，子女的教育取得往往被視為是父母傳遞自身社經地位優勢的關鍵環節。於是，來自什麼樣家庭背景的學生，傾向於進入什麼樣的學校就讀，受到許多研究關注。然而，相比於頂尖大學與明星高中的學生組成因為以升學考試為主的高度篩選而受到較多檢視，以居住區域為篩選而使得錄取與否更加取決於家庭背景的公立明星國中，其學生組成卻反而較少被討論。本研究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近兩萬名的學生樣本，探討在國小升國中的階段，家長的社會階級如何影響子女就讀的學校類型。援引 Bourdieu 的理論，本研究提出在由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相加總量與相對比例所建構的社會空間中，家長的位置會形塑其在選擇學校時的偏好與策略。研究發現，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可能分別導向兩種不同的教養實作模式，進而導致相較於高經濟資本但文化資本較低的家長傾向於選擇私立學校，高文化資本的家長不論其經濟資本高低均更傾向於選擇公立明星國中。此一發現延伸了過往將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擇一或合併成為社經地位指標的評估方式，指出這兩種資本可能有著不同的影響方向與路徑，從而貢獻於社會階級再生產之教育實證研究。

關鍵詞：學校選擇、社會階級、家長選校、私立學校、明星學校、文化資本

School Distinction: How Social Class Shapes Parental School Choice

Abstract

In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often regarded as a key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parents transmit their socioeconomic advantages. Consequently,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understanding the types of schools students from various family backgrounds tend to attend. However, while many studies focus on the composition of students at elite universities and prestigious high schools, which are shaped largely by highly selective entrance exams,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restigious public middle schools, where admission is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residence and thus closely tied to family background. Using data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parents' social class influences the types of middle schools their children attend. Drawing on Bourdieu's theory, the study posits that parents' school choices are shaped by their positions within a social space—defined by the total amount and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correspond to distinct modes of parenting practices,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school choice preferences: parents with high economic capital but lower cultural capital tend to favor private schools, whereas parents with high cultural capital—regardless of their economic capital—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prestigious public schools. These findings challenge traditional evaluatio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that often consid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either separately or as a combined measure, demonstrating instead that these forms of capital may operate through distinct mechanisms. By uncovering these divergent pathway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lass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Keywords: School Choice, Social Class,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 Private School, Prestigious Public School, Cultural Capital

目次

壹、前言	1
貳、文獻探討	4
一、何謂學校選擇？英美與臺灣的不同脈絡.....	4
二、學校選擇的樣態：三種學校類型之分析架構.....	6
三、從階層到階級：社會空間與學校選擇.....	11
四、學校選擇作為教養實作：經濟或文化資本主導的兩種教養腳本.....	15
參、資料與方法	18
一、資料來源.....	18
二、變項操作.....	19
三、描述統計.....	28
四、分析策略.....	30
肆、分析結果	31
一、誰就讀私立學校？經濟解釋的不足.....	31
二、私立學校或明星國中？社會階級的影響.....	34
三、學校選擇作為教養實作？兩種結構性的策略與偏好.....	37
伍、結論與討論	41
參考文獻	44
附錄	49

表次

表 1 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之樣本分布.....	20
表 2 三種學校類型之基測成績分布.....	21
表 3 家庭收入與雙親教育之樣本分布.....	23
表 4 概念與變項操作化.....	27
表 5 變項依學校類別分組之描述統計.....	29
表 6 就讀私立學校之邏輯迴歸模型.....	33
表 7 家長學校選擇之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	36
表 8 兩種教養腳本之教養實作變項檢驗.....	37
表 9 家長教養腳本與學校選擇之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	39
表 10 教養腳本與學校選擇.....	40

圖次

圖 1 社會空間與品味判斷.....	13
圖 2 社會階級與教養腳本.....	15
圖 3 分析架構.....	19
圖 4 三種學校類型之學生認知能力與基測成績分布.....	21



壹、前言

論及社會不平等如何在代際之間傳遞，「教育不平等」往往被視為其關鍵因素：擁有優勢資源的父母能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從而讓子女更能夠競爭更高的社會地位。而說到教育不平等，頂尖大學與明星高中的學生組成與升學篩選，一直以來受到臺灣社會的高度關注。這關注或許有部分源於統計數字上的巨大差異：以國立臺灣大學為例，每年錄取的新生畢業於北一女中或建國中學這兩所高中者，在 1997 到 2000 年間高達三分之一（駱明慶 2002）；即便歷經多次考招變革，在 2011 到 2014 年，這比例仍有近四分之一（駱明慶 2018）。

然而，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明星高中高比例進入頂尖大學的升學通道，其實是升學制度下教育機會競爭的可預期結果。由於高中階段以升學考試分數為主要的篩選標準，這導致明星高中存在很強的「正向選擇」（positive selection），即學業表現更突出的一群學生更容易考取明星高中，同樣也更容易進入頂尖大學（莊奕琦、陳晏羚 2021）。與之相對，在國中階段——尤其是完全以居住區域為考量的公立國中——成績對於篩選機制的影響力相當微小。因此，值得往下追問的是，能夠考取明星高中的這些學生，更可能是畢業自哪些公立國中？

雖然缺乏詳盡的研究數據，我們仍然可以交叉比對檔案找到線索。以 2022 年臺北市的公立國中為例，其畢業生錄取建國中學或北一女中的比例，中正國中以 16% 居冠，往下龍門國中、敦化國中、金華國中以約 11% 並列，再來是師大附中國中部的 9%，五所皆是素具升學聲望的國中。¹ 與之相對，錄取率最低的五所國中——成淵高中國中部、重慶國中、實踐國中、東湖國中、北投國中——其錄取率全低於 1%。比對 2008 年之資料，同樣是這五所國中高居升學錄取率前五名，相隔十五年仍保持龍頭地位。² 並且，這些在升學競爭中取得亮眼成果的公立「明星國中」，不令人意外地成為家長爭相競逐的目標。同樣在 2022 年，臺北市公立國中額滿學校共 17 所，上述五所

¹ 〈111 年基北區國中會考錄取建中、北一女與附中人數統計〉（雪莉的數位生活，2022/7/29，<https://shirley.tw/111y-enroll-first-high-school/>

² 〈2008 年台北市明星國中大解析〉（李彥謀，2008/10/2），<https://ymlee.pixnet.net/blog/post/23122515>

學校全都位於榜上，而其篩選機制為比較設籍時間長短，最低錄取條件短則兩年、長則十二年。³

明星國中亮眼的升學成果是因為它們確實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品質，亦或者只是因為它們招收了社會經濟條件更寬裕的一群學生？此問題研究者不容易回答。畢竟，辦學品質和招生吸引力兩者往往形成相輔相成的正向循環，導致學校之間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吳昭儀 2011）。然而，研究者相對可以回答：就讀明星國中的孩子一般是來自什麼樣的家庭背景？並且，由於明星國中的篩選僅考量居住區域而不考量學業成績，故其錄取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家長而非孩子，於是我們可以重新描述此一問題：一般來說，具備什麼樣社會經濟條件的家長會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

從教育平等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證意涵。在理論方面，有別於高中階段以學生的升學考試成績來篩選，家長的影響範圍極其有限，國中階段不論是考量居住區域的公立學校或者獨立招生的私立學校，都給家長很大的操作空間——學生能不能錄取「理想」國中，非常取決於家庭背景的較量。釐清何種條件的家長傾向把孩子送進何種類型的國中，有助於我們釐清代間優勢傳遞的關鍵環節：家庭背景的差異如何影響就讀學校的差異，而通往教育成就的差異？

在實證方面，學校選擇是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題，而臺灣的國中學校是深入探究此一主題的絕佳脈絡。這是因為，雖然臺灣的國中與國小階段在前端篩選時同樣取決於家庭背景，但有別於國小階段後端不存在升學考試，國中階段後端存在全國一致的升學考試，此考試成果形成相對客觀與普遍的評估標準，讓家長得以在不同國中之間進行比較與排序。並且，由於臺灣素具升學聲望的國中經常是都市地區的公立學校，即便是負擔得起私立學校更高學費的家長，仍可能選擇透過遷戶口或購屋等方式把孩子送進明星國中（林忠樑、林佳慧 2014）。分析臺灣家長在孩子步入國中階段時的學校選擇，不僅能夠回答家庭背景對就讀學校的影響，更能夠討論面對「升學成果」與「公／私立」兩個軸線交織構成的不同學校類型，家長自身的社會條件是否形塑出他們不同的選擇偏好與策略。

³ 〈臺北市 111 學年度額滿國民中學暨改分發學校名單〉（師大附中中國中部，2022/7/11）。
https://jr.hs.ntnu.edu.tw/blog/2022/07/13/臺北市_111_學年度額滿國民中學暨改分發學校名單_111-7-11/

總結前述討論，在臺灣升學制度的背景下，當殷切盼望孩子能在未來升學考試取得成果的家長，碰到以升學成果而被賦予地位階序的國中學校，他們若是對於原先學區內的公立學校感到不滿，至少存在「遷入更好的學區讓孩子進入明星國中」與「負擔更高的學費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兩種學校選擇方案。由此，本研究的提問也就呼之欲出：首先，家長的社會階級如何影響其學校選擇？本研究將回答，何種背景的家長傾向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而何種背景的家長則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其次，家長的學校選擇背後是否存在結構形塑的偏好與策略差異？本研究將嘗試推論，不同社會階級的家長是否可能傾向於不同的教養實作，從而影響其選擇學校時的偏好與策略。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本文將於第二章探討相關文獻、第三章說明資料與方法、第四章呈現分析結果，最後於第五章提出結論與討論。



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學校選擇？英美與臺灣的不同脈絡

「學校選擇」(school choice) 此概念乍看直白，不外乎是指涉家長為孩子教育而選擇學校的過程；實則此概念涉及教育市場化與自由化等爭議，並且在英美與臺灣有相當不同的脈絡。在英美兩國，學校作為一種「選擇」起源於對公立學校辦學品質低下、效率不彰的批評，批評者主張將自由市場的原則應用於教育領域，透過鼓勵自由選擇帶動學校競爭進而提升教育品質，其中著名者如發放「教育券」(Educational Voucher) 之方案倡議 (Friedman et al. 1980)。隨著 1980 年代以雷根與柴契爾施政方針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盛行，教育市場化與私有化成為政策方向，學校選擇也隨之受到大力推動並成為論辯焦點 (Bowe et al. 1994; Sunderman 2010)。

在實證研究上，英美學者主要環繞著學校選擇究竟是提升教育品質或惡化社會不平等而展開討論。一方面，偏重效率取向者指出，推動學校選擇的地區，如美國密爾瓦基實施教育券、密西根州與亞利桑那州推動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s)，皆因為帶動教育市場競爭而使得該地區的一般公立學校受到變革壓力，進而提升整體教育品質 (Hoxby 2003a, 2003b)。另一方面，偏重平等取向者強調，整體品質提升的說法忽略了校間落差擴大的現實，且由於選擇能力與社經地位緊密相關，教育市場化可能導致弱勢背景的孩子更加集中在教育品質不佳的學校 (Ball et al. 1996; Fuller and Elmore 1996)。最後，家長選擇的因素與過程成為雙方共同關心的主題，儘管其意義不同：對於前者，不完全透明的資訊、存在缺陷的選擇是通往自由市場理想途中可逐步克服的阻礙 (Burgess et al. 2015; Hanushek et al. 2007)；對於後者，選擇從來無法與社會階級脫鉤，且可能成為學校有意操弄的標的 (Ball et al. 1995; Haber 2021; Jennings 2010)。

更進一步來看，實證研究中關於學校選擇的效果，除了選擇方案是否刺激該地區的公立學校之外，各種選擇方案——特別是不同學校類型——的效果差異也受到許多關注。較早被討論的是私立學校中學生的學習成就顯著較高此一現象，早期研究者將其歸因於私立學校的教育方式 (Coleman et al. 1982) 或組織環境 (Chubb and Moe 1988)。後續研究者則嘗試拆解私立學校的內部異質性，如天主教學校 (Catholic schools) 有較強的平等觀與行為規範，使得學生的學習落差較小 (Bryk et al. 1993) 或

更傾向修習較繁重或進階的課程 (Carbonaro and Covay 2010)。Berends (2015) 對於特許學校效果的回顧亦與此呼應，他指出特許學校作為一種基於法律授權而出現的學校類型，不同特許學校的教育方針與內容可能相差甚遠，導致實證研究中關於其對學習成就的效果從正面、中性到負面均有。並且，當研究者把特許學校拿來和所謂傳統公立學校做比較時，這些公立學校內部同樣有很大的異質性。與此一討論相呼應，本研究嘗試在臺灣的公立國中當中，區分出明星國中與一般公立國中兩種類型，以此回應公立學校的內部異質性。

另一方面，關於學校選擇的過程，社會條件的不同是否導致選擇能力的落差，進而導致學校之間的落差或區隔，在實證研究中是一大焦點。在美國，選擇方案的擴張減弱過往居住區域與分發學校之間的緊密連結，研究者如 Candipan (2020) 證實在經歷仕紳化 (gentrification) ——即高社經背景家長遷入——的鄰里當中，家長更傾向跳出 (opt out) 原先被分發的公立學校選項。除社會階級差異外，美國黑白種族隔離與衝突的歷史，更使得學校選擇同時涉及族群間學校區隔的複雜現象 (Reardon and Owens 2014)。在英國，Ball 等人 (1996) 訪談不同社會階級背景的家長，分析其學校選擇的偏好與策略有何差異。他們指出，相比於勞工階級家長的疏離與被動，中產階級家長在選擇過程中非常的積極且主動，不僅會透過人際網絡打聽不同學校的差異，更會實地走訪各個學校觀察其設備與師資。儘管這些中產階級家長又可以區分出兩種偏好類型——重視學業目標或重視適性發展——但他們對於教育系統的「內部知識」 (“inside” knowledge) 始終是他們「懂得」如何做選擇的關鍵 (Ball et al. 1996: 93)。延伸此一討論，本研究嘗試在「中產階級」家長中，根據其社會階級的空間位置不同，區分出不同的選擇偏好與策略，並以其社會條件的結構性差異予以解釋。

與英美的脈絡截然不同，當學校選擇的概念在 1990 年代被引入臺灣時，學者將 School Choice 翻譯為「家長教育選擇權」(吳清山 1999) 或「教育選擇權」(張德銳 1998)，不僅把選擇的範圍從「學校」擴張到「教育」，更為其冠上「權利」之名。之所以如此，必須考量 1994 年民間教育改革運動之時代背景 (李淑菁 2019)。該運動批判威權時期受國家高度管制的體制教育，主張教育不該是「國家之權力、人民之義務」而應該是「人民之權利、國家之義務」(薛曉華 1996)；且在政策方向上，「鬆綁」即放寬國家管制並引入「教育市場」，成為重要的共識 (吳清山 1999)。可以說，當援引英美經驗的教育市場化政策，與臺灣解嚴後社會力勃興的公民權利訴求相互結

合，使得學校選擇作為教育市場化的政策方案，被包裹進教育選擇權——家長與學生有權利選擇受何種教育、如何受教育——的論述之中。

概念的語詞轉變，不僅反映了脈絡差異，也導致實證研究的關注焦點頗為不同。儘管，部分研究者貼近學校選擇原初的脈絡，透過回顧學校選擇方案如教育券（符碧真 1999）或特許學校（秦夢群 2014）在英美的實施經驗，從而對臺灣的政策發展提出建議。然而，更多研究者關注「教育選擇權」，強調教育選擇作為公民權利的一環，對應 1990 年代「另類教育」如理念學校（森林小學、全人中學等）與在家教育等在體制之外萌芽的脈絡，並成為另類教育在日後以「實驗教育三法」法制化的重要理論基礎（張明輝、顏秀如 2005；陳榮政 2021）。最後，儘管家長選擇的因素與過程也有研究者關注，但或許因為教育市場化跟政治民主化同時並進的獨特脈絡，在筆者知識範圍所及，除了少部分對於選擇擴張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的理論省思外——包含弱勢族群的需求如何保障（周仁尹、曾春榮 2006）以及教育的市場化與公平性如何權衡（劉世閔、吳育偉 2004）——並沒有任何實證研究系統性地探究家長選擇背後的社會結構成因，以及教育選擇權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

回到當前的研究，本研究分析臺灣的家長如何為步入國中階段的孩子選擇就讀學校，以及這些選擇的背後存在何種社會結構成因。因此，對照本土的脈絡，本研究並非關注教育選擇作為一種權利，而是家長選擇學校的行為本身以及其社會平等意涵，意圖補足實證研究中相對欠缺的一塊。對照英美的脈絡，本研究儘管並不直接參與教育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政策論辯，但尤其受到英國社會學者對於學校選擇過程的實證研究啟發（Ball et al. 1996），同樣關切社會階級如何形塑家長之學校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以「家長學校選擇」（parental school choice）為題，意圖研究的不是學校選擇作為教育市場化或教育選擇權的一環，而是家長的學校選擇作為經驗現象本身。

二、學校選擇的樣態：三種學校類型之分析架構

釐清研究概念與範圍後，接下來將回顧臺灣本土的研究中關於家長學校選擇過程與因素之發現。在筆者文獻搜尋所及的範圍內，除了引入學校選擇概念之初的 1990 年代有零星幾篇期刊發表，往後二十餘年間的實證研究全都為碩博士論文出版。以下的

回顧優先聚焦國中教育階段，根據研究的學校類型屬於私立或者公立、研究方法採取量化問卷調查或者質性訪談依序討論之。

談及學校選擇，最直觀想到的通常是家長在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做選擇。因為，不論是英美或臺灣的教育制度，公立學校一般皆以居住區域為分發標準，而私立學校之錄取則往往不受居住區域限制，故家長捨棄公立學校轉往私立學校是非常明確的選擇行為。尚必須注意，在本研究所探討的國中階段，私立學校的組成樣態相比於在高中階段很不一樣。因為，有別於公立學校大多是國中與高中分立，私立學校的國中階段往往是其高中階段的向下延伸。此現象或許與過去國家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嚴格管制私人興學有關，如在林本炫（2006: 68）提供之 2004 年資料中，私立學校在國小與國中階段皆僅佔不足 2%，但在高中與高職當中卻均佔超過 40%。又如在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中，54 所私立學校樣本中至少有 50 所同時提供國、高中階段教育，這也是為何本文選擇以「私立學校」而非「私立國中」稱之。綜上所述，高中階段由於高中與高職的教育分流以及高比例的私人興學，導致其私立學校就升學成果而言有著極大的變異；與之相對，國中階段如本研究之私立學校樣本，不論其為私立國中或者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都更可能是私立學校中升學成果較為出色的一群。

在臺灣的量化研究中，楊馥綺（2012）針對臺中市六所私立國小之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在筆者文獻搜尋範圍所及，並未有針對國中階段之私立學校的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家長選擇學校時的考量因素面向首重安全性、行政與教學團隊與學習環境三者。研究者亦針對家長之不同背景變項——如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與職業等——「分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發現如專科學歷之家長比研究所以以上學歷之家長更重視安全性面向。較為可惜的是，這些關於社會背景與選擇因素的相關性均為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將自變項與依變項兩兩配對並逐一比較，沒有將其他變項納入統計控制，故未能建構相對完整之統計模型以進行推論分析。

而在質性研究方面，謝靜怡（2021）訪談雙北私立學校的 12 位家長，發現在國中階段，家長之所以選擇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係因認為公立國中儘管重視教學正常化，但行政效率不彰、管教鬆散且學生程度參差不齊；相較之下，私立學校行政回應快、管教嚴格且學生素質整齊，且大多有過往升學成果的保障——因為不論是促進學生直升高中部或考取明星高中，均能夠提升學生未來考取理想大學的機會。同時，在

師資方面，家長認為公立國中的教師因為有公教人員保障，若態度不積極也無可奈何；與之相較，私立學校的教師往往積極建立訊息管道、主動與家長溝通。當然，即有家長同意上述比較，私立學校相對高昂的學費也可能令其卻步，對此謝靜怡（2021: 92）亦指出「私校新生入學……第一個學期就大約要九萬臺幣，而其餘學期可能也要五到八萬元……家長的經濟能力會有一個水準以上才能負擔」。

觀察臺灣家長選擇私立學校的因素，行為規範與學業表現經常被提及，這點與英美關於私立學校——特別是天主教學校——的實證研究呼應。值得注意，臺灣家長往往在言談中把這兩者與學生之「素質整齊」相連結，即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謝靜怡 2021: 76）：相近的同儕背景會減少脫序行為，也會促進學業競爭。這一點不容忽視，因為不論是何種樣態的私立學校（如重視行為規範的單一性別宗教之學校、重視升學成果自國中部即以入學考試篩選學生之學校、提升國際流動提供雙語教學或國際班之學校等），放在本研究所關注的國中教育階段，它們相比於公立學校的共同差異，在於它們有較高的「篩選學生的自主性」（謝靜怡 2021: 45）。亦即，它們可以透過學費門檻、入學考試或面試審查等篩選方式，打造一個具備較高同質性的機構環境，從而讓家長為孩子選擇就讀——這是僅以居住區域為篩選的公立學校所難以達成的。同時也不妨比較，一旦到了國中升高中階段，升學考試所形成的人學成績門檻，將一併適用於公、私立學校，私立學校的成績篩選度反而往往不及明星高中。

接著轉向一個較容易被忽略但範圍更廣且樣態更複雜者，即家長在公立國中之間做選擇。臺灣地狹人稠的特性以及明星國中不乏公立學校的分布，使得透過掛／遷戶口或購置學區房產讓孩子就讀「更好」的公立學校並非罕見操作。以本研究之分析樣本而言，有近三分之一的家長在問卷中回報曾經為了讓孩子上比較好的學校教育而遷戶口（見表 4 之描述統計）。並且，家長即便未採取「跨學區」選擇的戶口操作，仍有可能留在既有的「學區內」並做出選擇：一來，部分鄰里會被劃為複數公立學校的共同學區，使得家長有複數選項（賴欣妍，2015）；二來，部分公立學校會被核准為自由學區（或稱開放學區），使該縣市內的學生不論居住鄰里都可選擇就讀。無論是跨學區或學區內選擇，其結果便是公立學校之間的招生狀況落差，一所「額滿學校」的周邊很可能是數所招生困難的學校，研究者稱其為家長選校時「西瓜偎大邊」之現象（吳昭儀 2011）。綜上所述，相比於學生就讀私立學校本身就是家長主動選擇的信號，學

生就讀明星國中既可能出於家長跨學區的主動選擇，也可能出於家長待在原學區內的被動選擇，這是公立學校選擇樣態之複雜性。

以量化研究而言，許淑貞（2011）針對新莊區十二所公立國中之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將家長選擇學校時在學校方面的考量因素分為八個主要取向，發現家長重視程度之前三名為教育理念取向、專業師資取向與學習成就取向。與楊馥綺（2012）的做法相同，研究者亦針對家長之不同背景變項分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同樣較為可惜的是，或許由於缺乏完整的統計控制，大多數的組間變異均未達到顯著水準，如針對前述三個最受重視的因素取向，不同教育程度家長對其重視程度並無顯著差異。

而在質性研究方面，盧靜怡（2022）訪談六位居住於彰化、雲林與屏東的家長，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跳脫原本學區讓孩子「越區就讀」，主要考量包含受明星學校光環吸引、縮短城鄉差距（鄉村硬體設備雖齊全但師資穩定性不足）、根據孩子個別差異讓其適性發展（如降低學習壓力或發找藝術才能）等。尤其值得注意，這些家長似乎更注重學校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滿足孩子的個別需求，並因而優先考量孩子的特質而非學校類型或學費，如受訪者所述：

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兩個小孩國中讀不同類型的學校，一個在私立一個在公立，其實跟學費高不高一點關係都沒有！只是因為兩個孩子的特質不同嘛！讀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成績的要求會不一樣，我當初就是以小孩能不能考上私立學校的資優班作為讀私校的評估標準，如果他的成績一般般，你把他放在競爭力這麼強的地方只會讓他更沒信心。（盧靜怡 2022: 115）

可以發現，對部分家長而言，找到最適合孩子的學校才是首要之務，學費高低只是次要考量。事實上，當比較的視野放在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時，私立學校的高學費常被視為是其經濟門檻；然而，當把明星國中相對於一般公立國中納入比較視野時，會發現其經濟門檻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盧靜怡（2022: 106）便指出「家長大多會提早幫孩子規劃就讀的學校……普遍提早到孩子出生時……便已將學區納入規劃」。這呼應前言提及的臺北市明星國中案例，如金華國中之錄取標準是連續設籍並居住（至少需提出公證租賃證明）六年以上，換算即孩子從升上國小前就要遷入該學區。考量到明星學區推升房價的效果（林忠樑、林佳慧 2014），就讀明星國中的成本在部分都市地區很可能更高於就讀私立學校。

但撇開經濟門檻的考量，引用段落所透露的另一個關鍵訊息，則是關於家長的學校選擇偏好。前已述及，私立學校能夠以其篩選機制創造同質性較高的同儕群體，因而使得家長可以根據特定教育目的將孩子送進對應的學校，但即便是私立學校家長亦承認其讓孩子「缺乏探索其他方面潛力的機會」（謝靜怡 2021: 71）。相較之下，辦學聲譽卓著的公立學校似乎相對更能滿足家長對於多元潛能與適性發展的想像，如盧靜怡（2022: 112）描述選擇跨區就讀公立學校的家長受到「人本教育思潮影響，希望孩子能夠快樂學習」。上述討論的提醒是，當比較的選項是私立學校或明星國中時，兩種選項間的差異或許不僅在於經濟門檻，更同時在於家長的教育理念：選擇私立學校者似乎更靠近意圖將孩子培育成特定的樣貌；選擇明星國中者似乎更靠近希望孩子發展出自身的潛能。此間差異或許近似於藍佩嘉（2014）對於中產階級父母追求「競爭流動」或「自然發展」的兩種教養腳本分析，故將於後文討論教養實作時更深入闡述。

綜整臺灣關於家長學校選擇的實證研究，本研究提出兩個主要的研究缺口。首先，如盧靜怡（2022: 115）訪談之家長讓兩位孩子分別就讀私立學校與跨區就讀公立學校，可見家長在選擇學校時既不是只比較公立與私立學校、也不是只比較不同的公立學校，而是在學區內的公立國中、學區外的公立國中以及私立學校三類選項之間做選擇。然而，既有研究往往先劃分特定的選項如私立（謝靜怡 2021）或公立（盧靜怡 2022）學校之家長，再往下討論其選擇的因素，無法完整描繪家長在同時面對多種選項時的策略與偏好。其次，既有研究儘管充分討論家長選擇學校時的考量因素，卻沒有系統性地分析這些考量因素如何受到家長自身的背景與條件形塑，因此較難直接回應學校選擇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聯。一來，既有研究以「家長學校選擇權」框構學校選擇，因而更加關注家長是基於哪些因素做出選擇，而非不同社會背景的家長是否有不同的選擇偏好與策略。二來，既有研究的樣本來源較為局限，質性研究受訪者數量相對有限又多以滾雪球模式蒐集家長樣本，未能比較不同社會背景家長之間的差異；量化研究儘管樣本數量較多，但侷限於特定行政區域的特定學校類型，未能進行跨區域、跨學校類型之比較。

回到當前的研究，針對上述兩個研究缺口，本研究依序嘗試補足。首先，本研究提出三種學校類型之分析架構，在概念上區分出私立學校、辦學聲譽卓著的公立國中即明星國中以及其他的一般公立國中三類學校類型，以此捕捉家長同時在「公私立學校之間」與「不同公立學校之間」做選擇的行為樣態。並且，透過在公立學校中區分

出明星國中與一般公立國中，本研究能夠回應公立學校內部的高度異質性，在實證上嘗試建構真正能夠與私立學校相對應的學校選擇方案即明星國中。其次，本研究以教育平等為核心關懷，分析的焦點並非選擇特定學校類型的家長是出於什麼樣的考量因素，而是不同社會背景的家長可能出於什麼樣的考量因素而選擇不同的學校類型。並且，為了回應過往研究的資料局限性，本研究選擇使用涵蓋全臺灣逾三分之一公私立國中且具備抽樣代表性的大型追蹤資料庫來進行分析，透過近兩萬筆的樣本，系統性地分析家長社會背景與學生學校類型之間的關聯。

三、從階層到階級：社會空間與學校選擇

意圖系統性地分析家長社會背景與學生學校類型之間的關聯，則必須先回答的問題是：社會背景應該如何衡量？誠然，教育實務與學術中並不乏描述學生家庭背景的語彙，諸如弱勢家庭背景、低社經地位、經濟與文化不利等。然而，相較於能具體衡量的家庭背景指標包含家長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與雙親職業等，前述語彙無疑都是某種概括後的分類。因此，從具體指標到社會背景這段概念化的過程，需要過往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的指引。

在量化實證研究中，「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 是重要的主題。所謂「階層」(stratum) 就其字義，是指有垂直高低之分的層層堆疊。具體而言，在社會階層化的圖像中，社會可以比擬為一座高塔，由塔頂到塔底層層向下，由此也就延伸出如上層階級、中下階層或攀爬社會階梯 (social ladder) 等比喻。從這樣的視角，衡量社會背景的理想指標應該是一個單一向度的、連續性的因而可以比較高低的指標——而這也的確符合當前研究的版圖。Barone 等人 (2022) 選取九個代表性期刊如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與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等，統計其在 2015 到 2019 年間中以社會背景 (研究者稱其為 “socio-economic position” 即「社會經濟位置」) 為解釋變項的量化研究。結果發現，社會背景的概念化與操作化可以分為「收入」、「職業」與「階級」三大類，當中收入與職業佔大約八成，而階級僅佔大約兩成。

這些指標當中，「收入」或許最為直觀，儘管不同計算方式如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薪資 (salary)、所得 (earning) 會有數字差異 (Torche 2011)，但始終都是非常容易量化的連續性指標，在涉及勞動市場的研究中尤其普遍。再者，「職業」乍看

之下是一個類別性的指標，但實際上如 Blau 與 Duncan (1967) 關於教育與社會流動經典的「地位取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當中便是把各個職業轉換為連續性的「職業聲望」指標。並且在後續的研究中，職業聲望指標被認為具有跨國的普遍性與可比較性 (Treiman 1977)。最後，這些單一向度的連續性指標已經相當普遍，其影響範圍已經不僅止於收入與職業聲望而已，例如教育程度經常被轉換為教育年數作為指標、社會經濟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時常以職業聲望或混合收入來衡量，更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ISA) 定義出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地位指標」(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將社會背景的不同向度壓縮成為一個單一向度的標準化分數。

然而，單向度的階層並非唯一操作化社會背景的方式，正如社會學家 Erik Olin Wright (2015/李屹譯 2022) 所呼籲，將「階級」概念引入量化實證研究能有其獨特的貢獻。從理論傳統來看，「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的概念發展自 Karl Marx 的理論，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社會上將只存在兩種人：一是掌握生產工具者，稱為資產階級；一是未掌握生產工具者，稱為無產階級 (Marx and Engels 1998)。當然，日後的發展並未如當時理論預測，故階級的概念也在這之後經歷演變與修正。當前較有影響力的兩種社會階級概念建構為新韋伯主義 (Goldthorpe 2000) 與 Wright 所主張的新馬克思主義 (Wright and Martin 1987)。這兩者同樣以職業為討論核心，新韋伯主義——根據最主流的 EGP 分類框架——以專業性與自主性為兩軸區分出七大類階級 (Goldthorpe 2000)；新馬克思主義則是以資本、權威與技術的有無三個向度區分出八大類階級 (Wright and Cho 1992)。本研究儘管不擬探討這些分類框架的具體細節，但從中吸納一個重要的精神：社會的圖像或許不是一座高塔，當中的人們按照其階層呈現單一向度的連續性差異 (difference)；社會的圖像或許更像是一個多維度的空間，不同的人群之間呈現多個向度的類別性區分 (distinction)。

將社會階級理解為人群之間的「區分」，讓本研究的理論視角轉向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1984) 的著作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其主標題亦被翻譯為「秀異」或「區判」)。根據 Weininger (2005)，Bourdieu 對於社會階級的分析所採用的是「社會空間」(social space) 之概念，而社會空間的建構主要取決於「資本總量」與「資本組成」兩個軸線：前者即各種形式資本的總和；後者即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相對比例。Bourdieu (2002) 將社會空間呈現如圖 1，以上半部而

言，同樣是屬於高資本總量者，上半部右側（第一象限）是「經濟資本佔比高於文化資本」者、左側（第二象限）是「文化資本佔比高於經濟資本」者——前者如中小企業主、後者如大專學院教師——這兩群人即便資本總量相近，但因為其資本組成的相對比例不同，故處在社會空間中截然不同的位置，並因此有著截然不同的品味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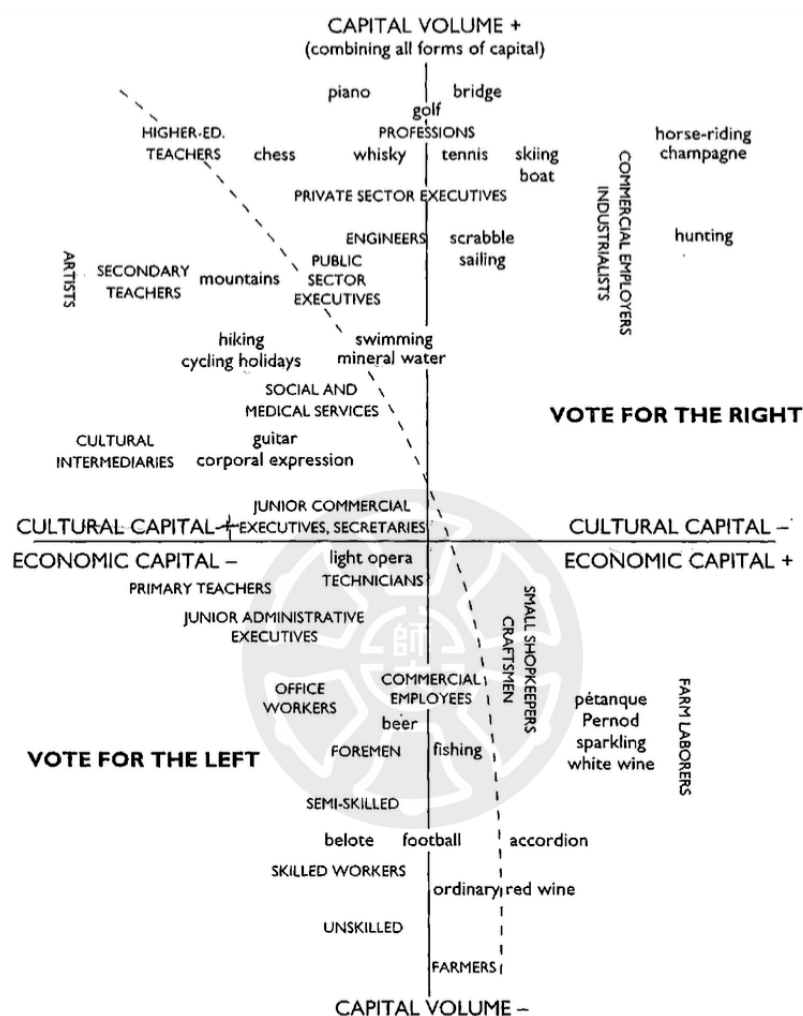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空間與品味判斷

資料來源：取自 Pierre Bourdieu (Bourdieu 2002: 270, Figure 19.1)。

此種建構社會階級的方式，相較於新馬克思主義或新韋伯主義的階級建構，更明確地把「文化資本」的概念納入，因此很適合引入教育領域的研究。因為，在教育場域的相關實作中，文化資本往往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Lareau and Weininger 2003)。以學校選擇而言，如 Ball 等人 (1996) 分析英國中產階級家長選擇學校時的內部知識，很可能便是其文化資本的體現。又如 Wu (2014) 描繪中國中產階級家長把孩子送進「重點校」的過程中，經濟資本可以轉換成文化資本，如花錢讓孩子到這些學校的相關補

習班「佔坑」；文化資本也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如在補習班取得好成績可以此減免學校選擇費用（參 Liu and Apple 2016）。本研究延續兩種資本的討論，但與該研究略有不同，本研究並非關注家長選校過程中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形式轉換」（Bourdieu 1986），而是關注在由這兩種資本之總量與組成所建構的社會空間中，家長的位置如何形塑其選擇的策略與偏好。

回到當前的研究，延伸 Bourdieu 的討論，若社會空間中的不同位置的行動者可能形成不同的品味判斷，那麼這些不同位置的行動者是否也可能在選擇學校時呈現出不同的策略與偏好？根據前一節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將學校類型區分為三：一般公校、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對照圖 1，雙軸社會空間的下半部即資本總量較低者，由於選擇條件的相對匱乏，他們更可能集中在一般公校；而上半部即資本總量較高者，則是本研究所聚焦討論的群體：他們會如何在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之間做出選擇？前已述及，選擇私立學校的家長相對重視經過篩選的同質性同儕組成，其背後可能是偏向目標導向的思維，重視教育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聯性；與之相對，選擇明星國中的家長相對重視辦學良好的多樣性學校環境，其背後可能是偏向發展導向的思維，重視多元環境對適性發展的重要性。基於此，本研究的假說是前一群家長更可能位於社會空間的第一象限（經濟資本佔比高於文化資本），而後一群家長更可能位於第二象限（文化資本佔比高於經濟資本），亦即：

研究假說一：高經濟資本的家長傾向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而非明星國中。

研究假說二：高文化資本的家長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而非私立學校。

然而，這兩個研究假說尚未能解釋另一群重要的家長：那些同時具備高經濟資本與高文化資本的家長、那些位於社會空間最上方兩象限中間的家長，他們傾向如何選擇？值得注意，單憑前兩個研究假說成立，尚不能完全說明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確實導向不同的偏好。因為，除少數最高度競爭的明星國中外，私立學校通常有更高的經濟門檻，故高文化資本的家長之所以傾向選擇明星國中，也可能是經濟資本有限下不得不然的結果。然而，在兩種資本均高的家長群體中，經濟與文化資本均不構成限制，故他們的選擇傾向將更直接地反映其偏好與策略。對此，本研究的假說是在學校選擇上文化資本比經濟資本更有影響力，故這些家長同樣傾向選擇明星國中，亦即：

研究假說三：高經濟資本且高文化資本的家長更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

四、學校選擇作為教養實作：經濟或文化資本主導的兩種教養腳本

倘若家長社會階級與學生學校類型之間的關聯可以建立，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此一關聯背後的理論解釋為何？本研究援引教養實作之理論與實證，將學校選擇放入家長教養實作的整體中分析。亦即，家庭教養實作和家長學校選擇並非相互獨立的現象，倘若學校選擇部分反映了家長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那麼教養實作可能也部分反映了家長的社會位置，並且教養實作的整體模式——即藍佩嘉（2014）所定義之「教養腳本」——可能部分解釋了從社會階級到學校選擇的過程。

值得注意，相比社會階級在社會階層化研究中相對邊緣，社會階級在教養實作研究中相對主流。美國研究者如 Lareau（2002, 2003）除對比黑人與白人家庭外，便是對比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家庭。並且，此種中產階級相對於勞工階級二元劃分也被臺灣研究者如藍佩嘉（2014）與石易平（Shih 2019）引入。如藍佩嘉（2014）先根據資本總量的高低區分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兩類家庭，再依據追求的目標區分四種教養腳本。如圖 2 呈現，圖中上方中產階級的教養腳本，不論是追求國際競爭力或自然成長，皆呈現 Lareau 所謂的「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特徵，即家長緻密地規劃與安排孩子的學習與休閒活動；與之相較，圖中下方勞工階級的教養腳本，追求自然發展者呈現高度自由放任，追求階級流動力者則因為自身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相對缺乏而有心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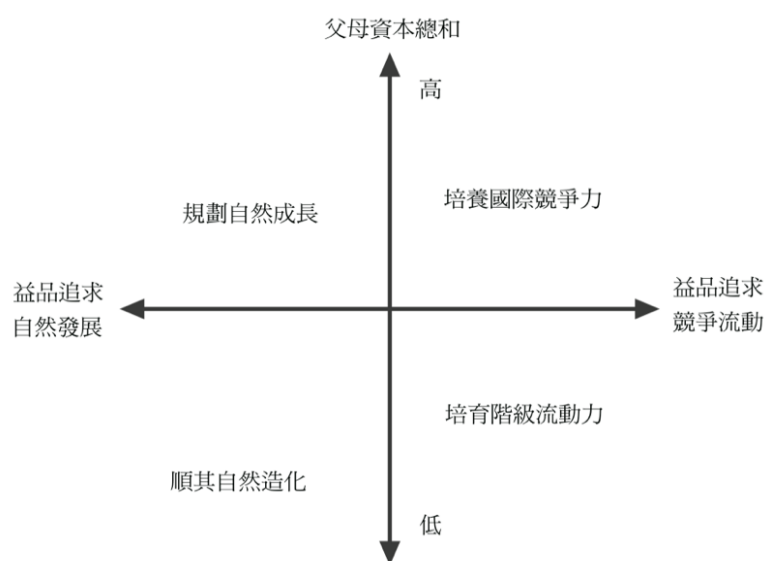


圖 2 社會階級與教養腳本

資料來源：取自藍佩嘉（藍佩嘉 2014: 135，圖一）。

在圖 2 的基礎上，本研究嘗試以兩個環環相扣的論點延伸藍佩嘉（2014）的分析。首先，該研究同樣援引社會空間的概念而以資本總量為縱軸，但較為可惜的是它相對忽略了資本組成之橫軸，因而未能討論不同形式的資本是否可能發揮不同的影響。具體而言，藍佩嘉（2014: 135）指出「中產階級父母具備相對充分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在教養上追求多元發展，而不只是獨尊智育」；然而，倘若並非所有中產階級家長都同時具備「充分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則不同的資本組成亦有可能會影響家長所發展出來的教養腳本。其次，承接上點，該研究儘管辨認出「中產階級家長」在教養實作上的內部異質性，卻僅以家長所追求的是發展導向（自然發展）或者目標導向（競爭流動）解釋之，未能將其放入資本組成的視角解釋其結構成因。換言之，分析家長資本組成的不同，恰有可能幫助研究者解釋家長的追求何以不同。

為回應這兩點，本研究嘗試從階級的二元劃分延伸到社會空間的兩軸建構，將資本組成的軸線納入對教養實作的分析。也即是說，有別於過往研究大多探討中產與勞工階級（以資本總量區分）所導向的教養腳本有何不同，本研究嘗試探索經濟與文化資本（從資本組成觀點）所可能導向的教養腳本有何不同。以圖 2 解釋，此一嘗試聚焦在圖中上半部的中產階級家長，但不是以其益品追求的不同、而是以其資本組成的不同，嘗試在其「規劃栽培」教養腳本中，進一步區分出「文化資本主導」（文化資本佔比高於經濟資本）與「經濟資本主導」（經濟資本佔比高於文化資本）兩種次類型的教養腳本。具體而言，本研究提出，較高經濟資本、較低文化資本的家長，可能與勞工階級家長同樣「缺乏足夠的文化資本來參與孩子學習，只能……更加依賴學校體制的介入」（藍佩嘉 2014: 135）；但與此同時，有別於勞工階級家長與學校的疏離，他們更可能依據自身對孩子的教育期待而積極地尋求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的協助——更接近追求競爭流動的一端。另一方面，較高文化資本、較低經濟資本的家長，他們更有能力也更願意花時間參與孩子的學習，於是更瞭解孩子的獨特性與個別需求——更接近追求自然發展的一端。

為了更進一步將這兩種次類型的教養腳本概念化，本研究將其分別連結到既有文獻所描述的兩種教養腳本——這兩種教養腳本同樣展現在資本總量較高的中產階級家長中，但其實作卻截然不同。一方面，Criag 等人（2014）分析「密集教養」（intensive parenting）的現象，發現在 1992 到 2006 年間，雖然澳洲母親參與勞動市場的比例上升，但他們花在照護與陪伴孩子的時間卻並未減少，具體表現在花時間與孩子對話、

陪伴孩子進行休閒活動等。本研究提出，以更長時間的親職陪伴與更高品質的親子互動為特徵的此種「密集教養」之教養腳本，很可能與文化資本而非經濟資本更為相關。以臺灣脈絡為例，1990 年代在民間教育改革運動以及另類教育發展中成為重要論述基礎的「人本教育」理念（黃武雄 2013），在如人本教育札記等出版品中，對於家長應該如何與孩子對話、如何給予孩子情緒支持、如何觀察孩子的特質多有闡述。

另一方面，Ma 與 Wright（2023）提出「外包的」規劃栽培（“outsourced” concerted cultivation）此概念，以此分析東亞脈絡中高速經濟發展所造就的一批透過經濟實業翻身的「新富階級」（“new rich” class）。他們發現，這些家長因為自身對於教育場域不甚瞭解，卻又同時希望子女在國際性的教育流動中具備競爭力，於是在選擇花錢給專業的教育機構讓它們培育孩子。本研究提出，此種「規劃外包」（concerted outsourcing）之教養腳本——與密集教養相對，很可能表現為親子時光的減少——很可能與經濟資本而非文化資本更為相關。以臺灣脈絡為例，TEPS 資料蒐集的 2001 年，恰好是臺灣經歷 20 世紀後半段「經濟奇蹟」之後的歷史時刻。自身未必受過太多正式教育但擁有寬裕經濟資源的家長，如果希望孩子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而非單純繼承家業），很可能會在思考與規劃後，選擇將教養更大比例地託付給外部教育機構執行。

必須注意，這兩種次類型乃是概念上的類型學區分，旨在幫助研究者建立研究假說與解釋社會現象；現實中，完全只有經濟資本或者完全只有文化資本的兩類家長並不存在。如 Sherman 與 Harris（2012）所提醒：由於現實中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同時並存，導致研究者往往以文化因素來解釋行動者偏好，而將經濟因素視為限縮行動的資源條件；但實際上，文化與經濟因素各有其關聯的偏好與策略，並相互交織與影響。

回到當前的研究，這兩種教養腳本可能如何對應學校選擇？臺灣的私立學校有不少以勤管嚴教聞名，當中亦不乏採取全日住宿制者；與之相對，高度競爭的公立明星國中，儘管其篩選機制與住宿條件能提供的同儕同質性與教養替代性很難比得上私立學校，卻往往因其環境多元性而獲得部分家長的青睞。循此，本研究推論私立學校因為更契合規劃外包之教養腳本而相對受高經濟資本的家長偏好，而明星國中因為更契合密集教養之教養腳本而相對受高文化資本的家長青睞。若此推論成立，應可見到：

研究假說四：經濟資本主導的規劃外包，與學生就讀私立學校顯著正相關。

研究假說五：文化資本主導的密集教養，與學生就讀明星國中顯著正相關。

參、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選擇「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為資料來源 (Huang and Hauser 2010)，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TEPS 採取多階段分層抽樣，多階段係指先抽取學校、再從學校中抽取班級、最後從班級中抽取學生的設計；分層則是指其樣本學校依比例涵蓋都市與鄉村、公立與私立、漢人與原民。分層設計在此尤其重要，由於本研究所分析之國中階段一般採學區制，相比於高中或大學，具有較強的地域特性，故此一抽樣方法能保障樣本具有涵蓋全臺、涵蓋公私立學校之代表性。其次，TEPS 涵蓋範圍相當廣，第一波之國中樣本包含 279 所公立學校、54 所私立學校，對照當時公立國中總數 882 所，涵蓋率超過三成。再者，由於學生的學業能力在升學篩選中是重要變項，但跨區域比較時，學生升上國中之前的國小成績很難有一致轉換標準，TEPS 的學科綜合能力測驗，在學生剛升上七年級時舉行，可以作為有比較基準的替代指標。最後，TEPS 發放對象涵蓋不同角度，包含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問卷，尤其是家長問卷中有較為詳細的關於省籍、教育、收入與職業等相關變項，有助於本研究建構社會階級之衡量指標。此外，TEPS 是貫時性的追蹤調查，同一位學生，在 2001 年第一波調查時為國中一年級，兩年後第二波追蹤調查時為國中三年級，後續還有學生升上高中、大學甚至進入社會的追蹤調查，有助於未來持續探究學校選擇的後續影響。

透過中央研究院建置之「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SRDA)，本研究取得 TEPS 之限制版資料。具體使用的資料檔有三，包含第一波調查的國中學生問卷資料、家長問卷資料以及第二波調查後補充之的國中學生基測分數資料。此三個資料檔的樣本數分別為 20,055、19,779、18,929。其中，家長問卷預設由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填寫，若填寫者並非雙親之一，則問卷中的雙親背景變項與學校選擇主體將不一致，故本研究將分析限定在由雙親其中一人填寫問卷的 19,053 個樣本。三個資料檔先進行變項操作與資料合併，再排除缺失值，最終共有 18,465 個樣本。⁴

⁴ 基於研究透明性與可再生產性的考量，本研究之資料整理與分析之程式碼均完整上傳至雲端。請見 <https://github.com/wangtakun/TEPS-School-Distinction.git>

二、變項操作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家長之社會階級，依變項為學生所就讀之學校類型，即家長學校選擇之結果。研究分析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先納入控制變項，分析社會階級對學校類型的影響；第二階段再納入機制變項，藉此分析教養實作的效果。分析架構如圖 3，圖中由左至右大致符合變項的相對時間順序，實線單箭頭表示影響路徑，虛線雙箭頭表示相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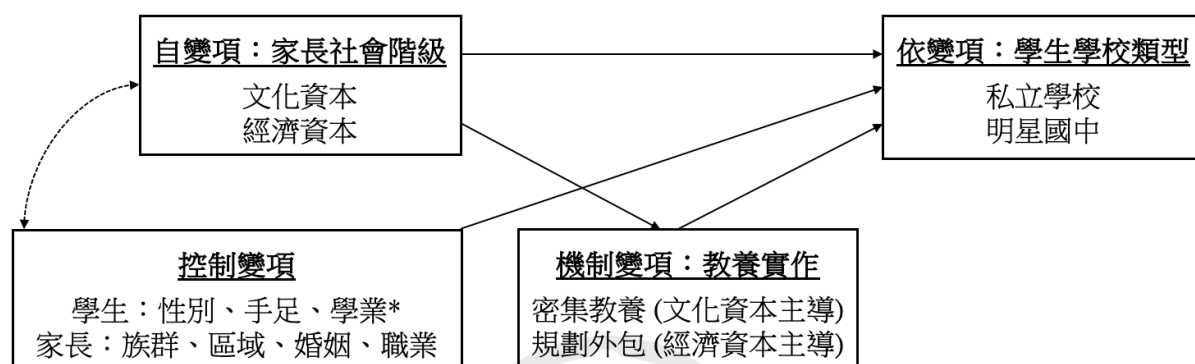


圖 3 分析架構

* 學業變項採進入國中時之測驗結果故時間序在機制變項後，本章第四節會特別處理。

(一) 依變項

三種學校類型的建構是本研究的一個特色。有別於過往研究分別討論家長為何捨棄公立國中而選擇私立學校，或者家長為何選擇跨區就讀其他公立國中，本研究同時考量家長如何在一般公立國中、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三種學校類型中做出選擇。變項操作化的挑戰是，有別於「私立學校」在資料中有二元變項可以直接判別，哪些公立國中屬於「明星國中」必須由研究者來嘗試定義。

如何定義「明星國中」？在筆者搜尋範圍中，過往文獻僅有研究學區對房價影響者有提出較為接近的操作型定義，即參考縣市政府公布的額滿學校名單，將額滿學校所在之學區定義為明星學區（林忠樑、林佳慧 2014）。然而，TEPS 資料因匿名性考量未公布學校名稱，亦未在學校問卷中設計額滿學校的相關變項，故此法並不可行。並且，更重要的是，單純考量學校額滿與否忽略了國中相對於國小最大的不同：國中後端的升學考試讓學校之間有相對普遍與客觀的排序標準參照。

如同吳昭儀（2011: 75）指出，不論是教師、家長與地方民意代表，談及公立國中的「聲譽」時，「升學成果」是經常被提及的判斷標準，表現在學校畢業生錄取地區前幾志願高中的「紅榜」，甚至導致「家長在選擇學校時，會特別留意該校歷年的升學表現。一旦發現標的學校考上第一志願的人數下滑，下學年的報到率就會立即出現波動」。又如黃毅志、巫有鎰（2011）將臺東縣全縣共 23 所國中分為市區學校、一般鄉鎮學校、原住民學校、偏遠學校、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六大類，而之中唯一一所的明星國中，其主要的特徵是學生成績好，僅次於縣內同樣也是唯一一所的私立學校，呼應前述學業成績與升學表現成為明星國中判斷標準的現象。

綜上所述，本研究推論「基本學力測驗」作為當時最重要的國中畢業升學考試，各所國中之畢業生在基測中的表現，將成為家長評估該校升學成果的最重要參照。循此，本研究使用 TEPS 資料庫後續追蹤蒐集的學生基測成績資料檔，計算各樣本學校中樣本學生的平均基測分數，以此作為評估該學校升學聲譽的替代指標。⁵ 同時，本研究考量從國小升上國中階段的學校選擇有顯著的區域性，即家長的學校選擇並不會以全臺為範圍，而是在區域內比較一般公立國中、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因此，本研究先以行政區域為基礎，劃定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與花東離島六大地區，再對各地區之公立國中以基測分數進行排名，最後根據將各地區基測分數平均排名前 20% 的公立國中定義為明星國中。變項建構結果如表 1。⁶

表 1 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之樣本分布

地區	樣本學生數	樣本學校數	樣本私校	樣本公校	明星國中 = 1
北北基	6,358	115	18	97	19
桃竹苗	1,767	37	7	30	6
中彰投	4,752	74	9	65	13
雲嘉南	2,183	43	14	29	6
高屏	2,309	42	6	36	7
花東離島	1,096	22	0	22	4
總計	18,465	333	54	279	55

⁵ 基測成績資料檔的樣本群體與本研究使用的第一波國中學生資料相同。具體而言，本研究使用 TEPS 第一波之國中一年級學生樣本，這些學生在兩年後升上國中三年級時被第二波資料蒐集給追蹤，又於其後被追蹤其基測成績。

⁶ 之所以採用前 20% 為劃分標準，是考量樣本中公立學校數目 279 所，對比私立學校數目 54 所，大約是五倍之數。因此，取公立學校的前 20%，所建構的明星國中數目會接近於私立學校數目。

為了初步觀察建構出來的明星國中變項之樣本特性，表 2 呈現三種學校類型之學生基測成績分布。可以發現，與過往研究指出升學成果是選擇私立學校的因素相符，私立學校有著最高的基測分數平均；同時，也與私立學校一般來說學生素質較整齊與行為管教較嚴格的狀況相符，其基測分數之標準差較小、四分位距亦較小。值得注意的是，明星國中雖然平均數較低，但其高分群可能比私立學校更多，表現在其更高的第三四分位數；相對而言，其第一四分位數則低上許多，顯示高低分群間的差距可能較私立學校大。最後，與這兩者相比，一般公校的基測分數很明顯有一段巨大的落差。

表 2 三種學校類型之基測成績分布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一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
一般公校	144.8	70.9	82	141	205
私立學校	193.7	59.0	153	204	240
明星國中	190.6	65.5	142	205	244

圖 4 進一步呈現三種學校類型之學生認知能力與基測成績分布，左邊是學生剛進入國中時的認知能力（即綜合分析能力測驗之標準化分數，控制變項處將說明）分布、右邊是學生國中畢業時的基測成績分布。觀察左右兩圖的對比，將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就認知能力而言，儘管一般公校落後於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但三種學校類型同樣呈現常態分布；但經過三年學校教育後，就基測成績來看，後兩者的學生在右側出現分布高峰、一般公校的學生卻是在左側出現分布高峰。儘管並非本文的分析焦點，但學校環境對於學生的升學考試成績有如此影響，仍然值得思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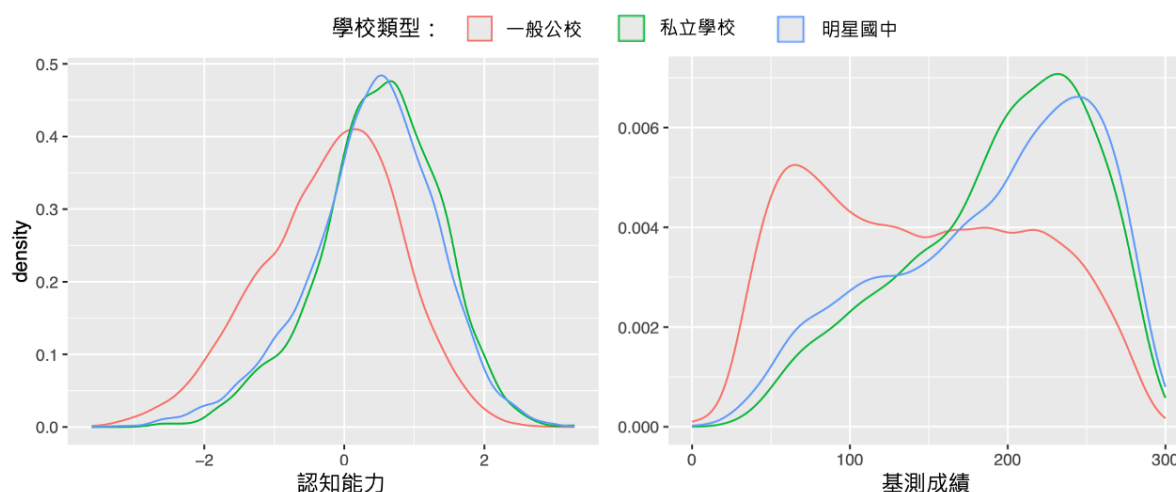


圖 4 三種學校類型之學生認知能力與基測成績分布

(二) 自變項

社會階級的建構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特色。有別於教育研究通常以單向度的連續性指標來衡量學生之家庭背景，如雙親教育年數、家庭月收入或者兩者合併後的社經地位指標，本研究試圖拓展社會階層化垂直分層的想像，援引社會空間的雙軸建構，提出以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作為定義社會階級的兩個要素。在統計操作上，因為社會階級不只涉及這兩種資本的總量、也涉及其相對組成，這意味著兩種資本可能各有其獨特的影響機制，不僅要分別建構兩者的指標，更要分析兩者的交互作用項。

具體之操作化方式，首先談經濟資本，本研究以家庭收入為指標，參照 TEPS 家長問卷之原始題項，將月收入十萬以上視為高經濟資本，以此建構「家庭高收入」變項並編碼為 1。之所以選擇以十萬元標準建構二元變項，是因為從社會階級的角度，要捕捉的並非收入高低的連續性差異，而是人群中相互比較與劃界所形成的類別性區分。根據表 3，十萬元是題項中樣本收入分布的重要分界，僅有 13.8% 的家庭可以跨越這道分界，本研究認為以此作為經濟資本高低的標準有其合理之處。

接著談文化資本，這一點必須先回到理論予以說明，因為文化資本畢竟是歐洲社會脈絡發展出來的概念，要將其引入臺灣社會脈絡需要更多的思考。歐洲社會——特指社會學起源的英國與法國社會——傳統上存在貴族階級。因此，Bourdieu (1984) 在其所謂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中，文化資本很大程度上指涉法國社會中與傳統貴族階級品味相關的那些文化活動，在此為討論之便暫且以精緻文化稱之。當文化資本的概念被引入美國時，研究者亦對這個概念提出類似的反思，因為美國社會——與臺灣社會一樣——傳統上不存在貴族階級。然而，文化資本概念之所以如此普遍，或許反映它確實能開展出經濟資本以外的分析向度。事實上，Bourdieu (1986) 在分析資本形式與其轉換時，便把文化資本的概念拓寬到具身性的 (embodied)、物質化的 (objectified) 與制度化的 (institutionalized) 三種狀態，分別對應到例如肢體與言說的方式、書籍或藝術品的蒐藏以及學歷。根據 Lareau 與 Weininger (2003)，美國學者對這個概念的運用，至少在教育研究中，除了少數將其綁定在精緻文化 (如歌劇與紅酒)，多數時候指涉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即學歷。而學歷或者說教育程度也是臺灣學者如藍佩嘉 (2014) 在分析勞工階級家長之文化資本時的主要指涉。

循此，本研究參照 TEPS 家長問卷之原始題項，先將父親與母親之教育程度取其較高者合併為雙親教育程度，再將雙親具備一般大學或研究所學歷者視為高文化資本，以此建構「雙親高學歷」變項並編碼為 1。之所以選擇一般大學或研究所為標準建構二元變項，與前述家庭收入同樣是依循人群區分的邏輯。同樣根據表 3，一般大學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雙親至少一人具備一般大學或研究者學歷者僅佔 13.6%，視這些人為高文化資本，恰巧也於前述 13.8% 高經濟資本的比例相對應。

表 3 家庭收入與雙親教育之樣本分布

類別	家庭收入		類別	雙親教育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二萬以內	1,824	9.9%	國中或以下	4,953	26.8%
二到五萬	7,589	41.1%	高中或高職	7,896	42.8%
五到十萬	6,500	35.2%	專技或科大	3,111	16.8%
十到十五萬	1,652	8.9%	一般大學	1,857	10.1%
十五萬以上	900	4.9%	研究所	648	3.5%
總計	18,465	100%	總計	18,465	100%

(三) 控制變項

關於本研究之控制變項，以下分為學生與家長兩方面因素依序說明。首先是學生方面的因素，必須處理過往研究對於家長教育投入所提出的資源解釋。資源解釋指出，由於家庭資源有限，無法讓所有孩子都享有同等的資源投入，更受到重視的子女傾向於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循此，本研究把一系列在臺灣脈絡中可能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資源投入的因素納入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傳統華人社會中家長可能對於男孩有較高的教育期望）、手足（獨生子女或排行最長／最幼者可能享有更多教育資源）、學業表現（學業表現優異的孩子可能享有更有教育資源）、家庭結構（父母處於婚姻且同居狀態者可能更有資源投入子女教育）。這當中，學業能力通常較難測量，因為學生的國小學業表現不容易進行跨校比較，所幸 TEPS 在學生剛升上國中時便進行「綜合分析能力測驗」，此測驗分數被證實與學生在校成績與升學考試成績高度相關；並且，由於其係經過 IRT 模型轉換之標準化分數，更可以做跨校、跨縣市的比較。

其次是家長方面的因素，這方面先要說明，正如文化資本之指標將雙親之教育程度合併為單一變項所呈現，本研究將「家庭」視為選擇學校時的基本行動單位，因此在分析上並不嘗試區分父親與母親個別的影響，而是嘗試把雙親之變項以儘可能合於

理論的方式整合為一。帶著這樣的理解，接著討論可能與家庭收入或雙親教育有相關性的變項，包含地區、省籍與職業。第一是地區，本研究依照表 1 之六大地區分類將其納入控制變項。第二是省籍，過往研究指出省籍與教育程度、職業選擇均有相關（蘇國賢、喻維欣 2007），因此本研究先根據問卷題項將父母兩方整併為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與其他四類，再將雙親省籍合併為單一變項。第三是職業，本研究首先參照原問卷題項，將當中的九個類別依據技術或專業程度由低至高整併為五個類別：勞力工作者（原第七類「生產、設備操作及體力工」）、服務從業者（原第六類「買賣或服務工作人員」）、軍公教人員（原第一類「各級學校教師包括幼兒教育」與第二類「政府公務人員含軍警人員」）、專業技術者（原第三類「律師、法官、醫師、工程師、會計師」、第四類「其他專業與技術人員」與第五類「一般事務或業務人員」）與其他（原第八類「其他職業」與第九類「從來沒有工作過」）。接著，參照 Wright 與 Martin（1987），進一步考量職業是否擁有資本與權威：資本方面，自雇者且有聘僱至少一名員工者，視為擁有資本者；權威方面，排除自雇者後，回答自身為中階或高階主管者視為有權威者。總結來說，將雙親職業之技術、資本與權威三向度納入控制，旨在獨立出本研究所關心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效果。

（四）機制變項

在變項操作上，本研究的第三個特色，則是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將資本總量較高的中產階級家長之「規劃栽培」教養腳本，從資本組成的角度區分出由文化資本主導的「密集教養」以及由經濟資本主導的「規劃外包」兩種次類型的教養腳本。透過將這兩種教養腳本納入作為機制變項，本研究可以嘗試解釋從家長社會階級到學生學校類型這中間所可能存在的偏好與策略。

那麼，首先要釐清的問題是：作為主類型的「規劃栽培」教養腳本，具體對應到哪些教養實作？在實證研究中，Roksa 與 Potter（2011）以五個面向的變項來分析家長教養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聯性，包含教育期望（educational expectations）、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以及三個直接指涉規劃栽培的變項：有組織的課外活動（organize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家長學校參與（parental involvement with the child's school）以及親子溝通（parent-child discussion）。以下將依循這五個面向依序討論其資本組成意涵並說明具體操作化方式。

首先，教育期望由於是希望孩子取得足夠高的教育成就（如取得大學或研究所學歷），而非更寬泛的社會流動或經濟收入成果（如找到好工作或繼承家業），故雖然在不少情況中取得高學歷可能被認為是找到好工作的手段，但從概念上將其歸於文化資本主導。變項操作化上，採用問卷相同題項建構「教育期望」變項，將學生被家長期待取得大學以上之學歷者編碼為 1。

其次，文化活動如藝文展演，其特性在於花費未必高，但仰賴欣賞的知識與品味，因此本研究亦將其歸於文化資本主導。變項操作上，採用問卷題項建構「書籍展覽」與「藝術表演」兩個變項，將學生被家長回報在他國小時期有時或經常一同從事兩種活動者編碼為 1。

第三，有組織的課外活動通常是論及規劃栽培時幾乎均會被提及的變項，因為規劃栽培的定義即在於家長非常系統性地安排孩子的學習與休閒時間。然而，從資本組成的角度而言，有組織的課外活動尚可以根據其金錢花費與時間成本來進一步區分。對應經濟資本主導的規劃外包，本研究使用問卷題項建構「才藝班」與「出國遊學」兩個變項，分別將學生在國小時期有參與才藝班者，以及學生曾被家長安排出國遊學者，編碼為 1。因為，相比於文化活動如書籍展覽與藝術表演是由家長陪同孩子參加，其金錢花費較低、時間成本較高，這兩種活動均是由家長將孩子託付給教育機構，其金錢花費較高、時間成本較低。

第四，家長學校參與同樣值得討論。研究指出，相比於勞工階級家長，中產階級家長會透過參加學校活動、與教師有非正式互動等方式形成與學校間較緊密的關係（Lareau 2003）。然而，同樣是與學校關係緊密的中產階級家長，可能因為資本組成的不同，而使得互動的內容有所差異。具體而言，資本組成屬於較高經濟資本、較低文化資本的家長，在相對缺乏文化資本的情況下，可能更需要仰賴學校教育，因此這些家長與教師的互動內容會更加聚焦在具體的教育成果上，如學業表現與升學規劃。變項操作上，採用問卷中親師聯繫相關題項建構「學業聯繫」變項，學生被家長回報在他國小時期有時或經常為他的「功課或升學問題」主動聯繫學校者編碼為 1。

最後，關於親子溝通。理論上來說，家長花多少時間、如何花時間與孩子相處，應該是密集教養的重要指標；然而，分析上來說，機制變項之「時間序」必須在自變項與控制變項之後，方能提供更嚴謹的推論。例如，如果使用國中時親子相處時間為

機制變項，則相處時間少有可能是就讀私立學校的結果（更長的學校時間與更高的住宿比例），而非就讀私立學校的原因。因此，以上有關教養實作的變項（除教育期望外）皆採用家長對國小階段的回憶，即家長問卷之第三部分：「請回想一下他上國小的時候……」。由於這部分的題項沒有直接對應親子溝通者，因此本研究關於密集教養的變項，主要透過前述家長與孩子一同從事文化活動推論之。

在這五個面向之外，本研究根據臺灣的脈絡以及三種學校類型的區分，額外建構「遷戶口」與「教育存款」兩個變項，分別對應文化資本主導與經濟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因為，如同 Ball 等人（1996）描述英國的中產階級家長因為對於教育體制的「內部知識」而更有能力做選擇，臺灣的中產階級家長中高文化資本者，儘管更不仰賴學校教育，但更熟悉與理解學區與學校，並採取「孟母三遷」（盧靜怡 2022）式的學校選擇策略。因此，本研究之「遷戶口」變項將學生之家長回報曾經為了讓他上比較好的學校而遷戶口者編碼為 1。與之相對，私立學校的選擇並不由學區篩選、而是由學費篩選，因此當中高經濟資本者，在學校選擇之策略上可能更重視金錢儲備，故本研究之「教育存款」變項將學生之家長回報有為了他的教育存錢者編碼為 1。

總結前述討論，在中產階級家長的「規劃栽培」中，本研究以「密集教養」界定文化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具體包含教育期望、書籍展覽、藝術表演與遷戶口四個教養實作變項；並以「規劃外包」界定經濟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具體包含學業聯繫、才藝班、出國遊學與教育存款四個教養實作變項。表 4 綜整呈現本研究之依變項、自變項、控制變項與機制變項。

表 4 概念與變項操作化

類別	分析概念	模型變項	問卷題項操作化
依 變項	學校類型	私立學校	〔二元〕私立學校編碼為 1
	〃	明星國中	〔二元〕依照六大地區劃分，將地區內之公立學校依照平均基測成績排序，定義排序前 20% 者為明星國中並編碼為 1
自 變項	文化資本	雙親高學歷	〔二元〕雙親有一般大學或研究所學歷者編碼為 1
	經濟資本	家庭高收入	〔二元〕每月家庭收入十萬以上者編碼為 1
控制 變項	性別	男性	〔二元〕男性編碼為 1
	手足	獨生子女	〔二元〕無兄弟姊妹者編碼為 1
	〃	排行老大	〔二元〕無兄姊但有弟妹者編碼為 1
	〃	排行老么	〔二元〕有兄姊但無弟妹者編碼為 1
	學業表現	認知能力	〔連續〕綜合分析能力測驗之標準化分數
	家庭結構	雙親婚姻	〔二元〕雙親有結婚且未離婚或分居者編碼為 1 〔類別〕依照雙親之省籍編碼為：1 雙本省人、2 一本省一原民／其他、3 雙外省人、4 一外省人、5 雙原民／其他
	族群背景	雙親省籍	〔類別〕依照學校行政區域編碼為：1 北北基、2 桃竹苗、3 中彰投、4 雲嘉南、5 高屏、6 花東離島
	居住區域	地區	〔類別〕取雙親職業中專業技術程度較高者，將其編碼為：1 勞力工作者、2 服務從業者、3 軍公教人員、4 專業技術者、5 其他
	家長職業	雙親職業	〔二元〕定義自雇者且聘雇至少一位員工者為雇主，雙親中至少有一位雇主者編碼為 1
	〃	雙親雇主	〔二元〕定義非自雇者且為中階或高階主管者為主管，雙親中至少有一位主管者編碼為 1
	機制 變項	文化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	教育期望
〃		書籍展覽	〔二元〕小學時雙親有時或經常與他一起逛書店、書展或各種展覽者編碼為 1
〃		藝術表演	〔二元〕小學時雙親有時或經常與他一起聽古典音樂、觀賞舞蹈或戲曲表演者編碼為 1
〃		遷戶口	〔二元〕雙親曾為了讓他上比較好的學校而遷戶口編碼為 1
經濟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		學業聯繫	〔二元〕小學時雙親有時或經常為他的功課或升學問題主動聯繫學校者編碼為 1
〃		才藝班	〔二元〕小學時雙親讓他參加才藝班者編碼為 1
〃		出國遊學	〔二元〕雙親曾為他安排出國遊學者編碼為 1
〃		教育存款	〔二元〕雙親有為了他的教育存錢者編碼為 1

三、描述統計

表 5 呈現所有變項之描述統計（除地區已於表 1 呈現），並依照學校類型分組。從表中可以得到三部分重要的觀察。首先，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兩者具備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因為在幾乎所有變項中，這兩者都有著頗為接近的比例，並且這兩者的比例與一般公校存在很大的一段落差。以自變項「雙親高學歷」為例，全體樣本是 13.6%，在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卻分別高達 23.0% 與 27.3%；且雖然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之間相差不到 5 個百分點，這兩者卻同時與一般公校的 8.4% 拉高至少 14 個百分點的差距。再以自變項「家庭高收入」為例，全體樣本是 13.8%，而私立學校儘管以 29.4% 高出明星國中 6 個百分點，但更是要比一般公校高出 21 個百分點。

其次，控制變項的結果非常符合預期。學生方面，男性、獨生子女、排行老大、認知能力（學業表現的替代指標）、雙親婚姻之比例都是私立學校較明星國中來得高，符合教育投入的資源解釋，即承擔家長更高教育期待的子女會得到更多的教育資源。家長方面，先看省籍，本省籍在私立學校比例較高、外省籍在明星國中比例較高，符合本省人較多從事經濟實業、外省人較多進入公教領域的狀況（蘇國賢、喻維欣 2007）。再看職業，各類職業的比例在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相當接近，但隨技術程度由低至高，該從業人員會更多地往這兩類學校集中：勞力工作者在一般公校為 24.2%，比另外兩種學校類型者高出約 13 個百分點；專業技術者在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約 30%，比一般公校高出約 11 個百分點。而就職業所擁有的資本與權威來看，私立學校有 29.5% 之家長為有聘用員工的雇主，比明星國中高出約 12 個百分點；相較之下私立學校雖有 27.2% 家長為中高階主管，但這比例僅比明星國中高出約 1 個百分點。

最後，從機制變項來看，兩種教養腳本與學校類型的對應大致符合預期。一來，所有的教養實作變項均是在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之比例遠高於一般公校，符合中產階級家長規劃栽培的積極教養特性。二來，文化資本主導之密集教養，除教育期望與書籍展覽不符合預期外，藝術表演與遷戶口均是在明星國中的比例遠高於私立學校。三來，經濟資本主導之規劃外包，包含學業聯繫、才藝班、出國遊學與教育存款四個變項，全是在私立學校的比例遠高於明星國中。這樣的類別分布樣態不僅支持了在公立學校中區分出明星國中有其分析意義，更顯示從資本組成的角度進一步區分中產階級家長的教養實作或許可以帶來分析洞見。

表 5 變項依學校類別分組之描述統計

類別	變項	總平均	一般公校平均	私立學校平均	明星國中平均
依 變項	私立學校	.122	0	1	0
	明星國中	.194	0	0	1
自 變項	雙親高學歷	.136	.084	.230	.273
	家庭高收入	.138	.083	.294	.234
控制 變項	男性	.513	.512	.550	.496
	獨生子女	.058	.051	.083	.066
	排行老大	.345	.329	.397	.369
	排行老么	.367	.364	.344	.390
	認知能力	.008	-.191	.501	.400
	雙親婚姻	.906	.892	.944	.928
	雙親省籍				
	雙本省	.733	.741	.760	.689
	一本省	.056	.063	.034	.046
	雙外省	.042	.033	.054	.067
	一外省*	.136	.120	.143	.190
	其他	.032	.043	.009	.008
	雙親職業				
	勞力工作者	.200	.242	.106	.112
	服務從業者	.243	.236	.257	.258
	軍公教人員	.113	.088	.162	.172
	專業技術者	.223	.187	.305	.299
	其他	.221	.247	.171	.160
	雙親雇主	.145	.110	.295	.175
	雙親主管	.178	.138	.272	.259
機制 變項	教育期望	.478	.397	.685	.632
	書籍展覽	.354	.319	.429	.430
	藝術表演	.129	.108	.150	.186
	遷戶口	.324	.270	.404	.463
	學業聯繫	.256	.239	.339	.264
	才藝班	.657	.591	.830	.781
	出國遊學	.066	.043	.153	.092
	教育存款	.636	.592	.798	.689

* 雙親一本省一外省者歸入此類，詳參表 4。

四、分析策略

在說明資料來源、分析架構、變項操作與描述統計後，接著在進入第四章分析結果前，先說明整體的分析策略。如圖 3 呈現，分析架構主要有兩個階段；在具體分析上，則有三個主要步驟，分別呈現於表 6、表 7 與表 9。

首先，在引入明星國中這個本研究建構的學校類型之前，本研究首先比較私立學校相對於所有的公立學校，結果將呈現在表 6。在該表中，依變項是就讀私立學校之二元變項，因此採取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此種私立學校相對於公立學校的二元比較，可以與過去關於「誰就讀私立學校」的文獻對話。模型如下：

$$\text{logit}(\text{Priv}_i) = \alpha_1 \text{HEdu}_i + \beta_1 \text{HInc}_i + \gamma_1 (\text{HEdu} * \text{HInc})_i + \theta_1 \mathbf{X}_i + \tau_1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Priv* 為就讀私立學校之二元變項、*HEdu* 與 *HInc* 分別為雙親高學歷與高庭高收入之二元變項、*X* 為控制變項之向量、 ε 為隨機項。

接著，有了對話的立足點之後，本研究進一步引入明星國中此一學校類型，進入分析架構中提到的第一階段，即分析家長如何在一般公校、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三者之間做出選擇，結果將呈現於表 7。在該表中，依變項有三種學校類型，因此採取多變項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此模型會同時考量三種學校類別，因而超越過往公私立之間、不同公立之間的二元比較。模型如下：

$$\text{logit}(\text{SchType}_i) = \alpha_2 \text{HEdu}_i + \beta_2 \text{HInc}_i + \gamma_2 (\text{HEdu} * \text{HInc})_i + \theta_2 \mathbf{X}_i + \tau_2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自變項與控制變項均與方程式一相同，唯依變項改為 *SchType* 為就讀學校類型之類別變項。由於依變項有三個類別，故模型將分別比較就讀私立學校相對於一般公校、就讀明星國中相對於一般公校，意涵接近於進行兩次的邏輯迴歸。

最後，在分後家長社會階級與學生學校類型之關聯後，本研究進入分析架構的第二階段，即分析學校選擇背後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偏好與策略，結果將呈現於表 9。該表同樣延續表 7 的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但引入教養實作的機制變項。必須注意，如圖 3 註解所述，當納入機制變項後，由於前一階段控制變項中的認知能力（學業表現的替代指標）之測驗發生在國中入學時，故它理論上同時是自變項（家長社會階級）與機制變項（家長教養實作）的結果，因此會成為「對撞因子」（collider），並因此將從控制變項中移除，避免過度模型的過度控制（Elwert and Winship 2014）。

肆、分析結果

一、誰就讀私立學校？經濟解釋的不足

表 6 為就讀私立學校的邏輯迴歸模型。由於表中比較的對象是就讀私立學校相對於就讀公立學校者（含一般公立國中與明星國中），故本表的結果可以與過往針對家長為何選擇私立學校的相關研究對話。表中的前三個模型，依序加入的是自變項、控制變項、自變項之交互作用項；第四個模型將自變項與其交互作用項轉換成以含有四個類別的類別變項，僅有呈現方式不同，故控制變項的係數與標準誤並不改變。

先討論前兩個模型。模型一僅放入自變項，家庭高收入的影響係數高達 1.026，是雙親高學歷係數 0.313 的三倍以上。並且，模型二納入控制變項後，其結果如同描述統計一節的討論，幾個與資源解釋有關的變項，包含男性、獨生子女、排行老大、認知能力、雙親婚姻，皆有相當高的係數與顯著性；而描述統計提到的雙親雇主與雙親主管變項，同樣也有顯著之影響。這些控制變項的影響，將於後續表 7 更詳細討論。

在此先聚焦模型二的兩個自變項，其係數在納入控制變項後同時減弱約 0.4，但相比於高學歷的影響不再顯著；相比之下，高收入的係數仍處在 0.628 的高度顯著水準。這結果意味著，高收入家庭相對於收入不高的家庭，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的勝算會達到 $e^{0.628}$ 即 1.87 倍。可以說，此結果驗證了過往研究提及的現象，即私立學校的高學費形成經濟門檻，使得家庭收入較高者更有機會進入私立學校就讀。問題在於，這樣的現象時常被簡化為「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其孩子更容易就讀私立學校」，並因而忽略了一個亟待解釋的問題：為何高學歷跟高收入兩個變項的影響差異如此之大？本研究對於社會階級的界定提供回答此一問題的線索：若資本組成的差異會形構社會階級的不同位置，那麼有必要分析代表文化資本的雙親教育與代表經濟資本的家庭收入，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承接這點，模型三加入雙親高學歷與家庭高收入相乘之交互作用項。非常值得注意，此一交互作用項的係數是非常顯著且效果很強的負值（-0.671）。在解釋上，因雙親通常是先取得學位再進入職場而有收入，故此係數的意義是對於雙親不同學歷者（雙親有大學以上學歷相較於沒有者），家庭高收入（每月十萬元以上）所帶來的影響有何差異。具體來說，對於是否就讀私立學校，雙親沒有大學學歷者，家庭收入若達

到十萬元以上，其影響係數是非常顯著的 0.857，亦即其勝算將提高到 $e^{0.857}$ 約 2.36 倍；然而，雙親有大學學歷者，家庭高收入的正向影響卻會額外被加上 -0.671 的負向影響，其勝算僅會提高到約 $e^{0.857-0.671}$ 即 1.20 倍。此結果指向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相比於中低學歷的家長群體，在高學歷的家長群體中，高收入所帶來的經濟資源，對於他們把孩子送進私立學校的機率，提升相當有限。

要更直觀地理解這點，可以把兩個自變項及其交互作用項轉換為「雙親社會階級」之類別變項，其中包含低學歷低收入、低學歷高收入、高學歷低收入、高學歷高收入四組。⁷ 模型四以此變項為自變項，並把「低學歷高收入」家長設為參照組。結果發現，如同通常預期，相較於這群家長，學歷與收入均較低者、學歷高但收入較低者，皆顯著地更不容易把孩子送進私立學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是拿同樣具備高學歷與高收入的家長來比較，他們同樣更「不傾向」把孩子送進私立學校。

這個結果無法用過往「高社經地位家長更傾向讓孩子讀私立學校」的解釋來說明；因為，這些高學歷且高收入的家長就指標而言位於社經地位的頂層，但為何他們卻遠遠不比收入同等但學歷較低的家長那般傾向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如果私立學校並非他們所偏好的選擇，那他們傾向把孩子送去什麼樣的學校？此結果呼應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即家長的學校選擇並不只發生在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同時也發在一般公立學校與那些因升學成果而享有聲譽的公立學校——明星國中——之間。

⁷ 嚴格來說，雙親高學歷與家庭高收入均為二元變項，非高學歷者可能包含中高、中等、中低、低學歷，非高收入者同理。因此，此處所謂「低學歷低收入」之組名是簡略的名稱，實際內涵更接近「非高學歷且非高收入」組。然而，後者的命名方式可能造成表格呈現與讀者理解的困難，因此經過思慮後仍選擇採用前者相對簡略的命名方式。

表 6 就讀私立學校之邏輯迴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雙親高學歷	.313*** (.063)	-.083 (.072)	.207* (.088)	
家庭高收入	1.026*** (.058)	.628*** (.065)	.857*** (.077)	
高學歷 x 高收入			-.671*** (.129)	
雙親社會階級 (參照低學歷高收入)				
低學歷低收入				-.857*** (.077)
高學歷低收入				-.650*** (.105)
高學歷高收入				-.463*** (.103)
控制變項				
男性		.204*** (.049)	.207*** (.049)	
獨生子女		.644*** (.106)	.637*** (.106)	
排行老大		.203** (.069)	.199** (.070)	
排行老么		.029 (.070)	.031 (.071)	
認知能力		.462*** (.029)	.465*** (.029)	
雙親婚姻		.353** (.109)	.353** (.109)	
雙親雇主		.940*** (.059)	.904*** (.060)	
雙親主管		.400*** (.060)	.395*** (.060)	
截距項	-2.225*** (.027)	-3.791*** (.147)	-3.809*** (.148)	-2.952*** (.164)
AIC	13261.3	11597.5	11572.1	

註：N = 18,465。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部分控制變項未呈現於表中，包含：地區、雙親省籍、雙親職業。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私立學校或明星國中？社會階級的影響

前表驗證了家長的學校選擇不只發生在公立與私立學校之間，表 7 進一步呈現將公立學校區分為一般公校與明星國中所建構的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具體來說，本表中僅有一個模型，但其依變項有三個類別：一般公校（參照組）、私立學校（第一欄）、明星國中（第二欄）。在結果呈現上，第一欄與第二欄分別呈現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相對於一般公校的係數估計；第三欄則在同一模型中將私立學校轉換為參照組，呈現明星國中相對於私立學校的係數估計。

首先討論控制變項，著重觀察其在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兩欄的樣態有何差異。第一，資源解釋的相關變項，男性、獨生子女、排行老大、認知能力、雙親婚姻對於就讀私立學校的解釋力均大於就讀明星國中。尤其注意性別與家庭結構的相關變項：男性與雙親婚姻對於解釋就讀明星國中均不顯著，反映對子女的教育資源投入差異更可能表現在是否讓子女就讀私立學校上；而排行老么僅有在解釋就讀明星國中時卻相當顯著，反映明星國中的學區篩選模式，更可能讓出生順序較後的子女受益。雙親雇主同樣值得注意，即便在自變項捕捉學歷與收入後，雇主身分在解釋私立學校時的係數仍比解釋明星國中時高出 2.65 倍；主管身分則沒有如此明顯的差異。

以上討論可以集中在第三欄來觀察，此欄將私立學校設為參照組，直接比較明星國中相對於私立學校。因此，其係數為正值表示該變項預測會增加就讀明星國中的機率、為負值表示該變項預測會增加就讀私立學校的機率（由於僅轉換參照組而未改變模型，故第三欄的係數等於第二欄與第一欄之係數相減）。第三欄的控制變項中有四個最顯著的係數值，並且全為負數即傾向解釋就讀私立學校，包含男性、獨生子女、認知能力與雙親雇主。認知能力的結果符合預期，即私立學校的篩選機制，讓進入其中就讀的學生一般而言——用家長的話來說——素質較為整齊。

接著討論自變項。可以發現，第一欄在解釋就讀私立學校時，高收入的影響同樣超過高學歷，係數大小為 2.05 倍，且高學歷與高收入的交互作用仍然是顯著的負效果（-0.613）。援引前面的計算方式，對於是否就讀私立學校，雙親沒有大學學歷者，高收入將提高勝算到 $e^{1.030}$ 約 2.80 倍；然而，雙親高學歷者，高收入僅會提高其勝算到 $e^{1.030-0.613}$ 即 1.52 倍。更重要的是，此一交互作用的顯著負效果在第二欄並不存在。這意味著，在解釋就讀明星國中時，高收入有其正向影響、高學歷有更大的正向影響，

且這兩者的正向影響「並不會」相互抵銷。換言之，對於是否就讀明星國中，雙親擁有大學學歷將提高勝算到 $e^{0.779}$ 約 2.18 倍；而在有大學學歷的家長群體中，高收入會再更進一步提升其勝算到 $e^{0.562}$ 約 1.75 倍。兩個影響效果相疊加意味著，相對於學歷與收入均不高的家長，學歷與收入均高的家長，其就讀明星國中的勝算是 $e^{0.779+0.562}$ 即 3.82 倍，差異巨大。

最後聚焦到第三欄，直接比較明星國中相對於私立學校。聚焦在自變項，可以看到雙親高學歷與家庭高收入兩者的影響方向完全相反但均相當顯著：高學歷（文化資本）顯著提升就讀明星國中的機會；高收入（經濟資本）顯著提升就讀私立學校的機會。並且，在學歷與收入均高的群體中，高收入的負係數會幾乎被交互作用項的正係數給抵銷。這意味著，在高學歷的家長群體中，高收入不再會大幅提升他們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的機會。具體而言，若家長沒有大學學歷，高收入會增加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的機會，其影響為降低就讀明星國中的勝算到 $e^{-0.468}$ 即 0.62 倍，即降低 38 個百分點；但若家長有大學學歷，則不論其收入高低，皆會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其影響大約為提高勝算到 $e^{0.277}$ 即 1.32 倍，即提高 32 個百分點。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研究的前兩個假說得到證實，分別是「高經濟資本的家長傾向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而非明星國中」以及「高文化資本的家長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而非私立學校」。並且，交互作用項的分析，更進一步證實了研究假說三，即「高經濟資本且高文化資本的家長更傾向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這一系列結果呼應本研究對於社會階級的概念建構，即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可能各有其獨特的影響。尤其，對於高學歷且高收入的家長群體，明星國中是更被偏好的選擇，不僅能排除高學歷但較低收入的家長只是因為經濟資源有限而偏好選擇明星國中的可能性，更意味著當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同時充裕時，文化資本可能居於主導，與過往教育實證研究的發現相符。

表 7 家長學校選擇之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

	(1) 私立學校	(2) 明星國中	(2) - (1)
雙親高學歷	.502*** (.093)	.779*** (.073)	.277** (.097)
家庭高收入	1.030*** (.082)	.562*** (.078)	-.468*** (.091)
高學歷 x 高收入	-.613*** (.140)	-.194 (.121)	.418** (.143)
控制變項			
男性	.198*** (.050)	-.031 (.041)	-.229*** (.056)
獨生子女	.727*** (.111)	.308** (.096)	-.418*** (.123)
排行老大	.243*** (.072)	.172** (.058)	-.071 (.081)
排行老么	.097 (.072)	.239*** (.057)	.142 (.081)
認知能力	.609*** (.030)	.481*** (.024)	-.129*** (.033)
雙親婚姻	.378*** (.112)	.129 (.081)	-.248* (.125)
雙親雇主	1.023*** (.063)	0.386*** (.058)	-.636*** (.070)
雙親主管	.491*** (.063)	.300*** (.053)	-.191** (.068)
截距項	-3.952*** (.152)	-2.813*** (.113)	1.139*** (.171)
AIC	26601.5		

註：N = 18,465。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部分控制變項未呈現於表中，包含：地區、雙親省籍、雙親職業。第三欄之係數差係將同模型之參照組從一般公校專換為私立學校而得，故係數等於明星國中減去私立學校，顯著度則以模型估計之標準誤計算。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學校選擇作為教養實作？兩種結構性的策略與偏好

接著進入第二階段的分析，本研究將納入教養實作之機制變項。這部分除將認知能力排除於控制變項外，其餘的自變項與控制變項均相同，亦保持相同的欄位安排與解讀方式。⁸ 然而，在進入多變項邏輯迴歸之前，值得先驗證一個問題：本研究對於規劃栽培中兩種次類型教養腳本的區分是否符合實際狀況？

表 8 呈現自變項與機制變項之間的關係檢驗結果，其中包含八個邏輯迴歸模型，分別以八個教養實作變項為其依變項，在呈現上聚焦在自變項的係數與顯著度，省略控制變項以及自變項的交互作用項。倘若如本研究假說，密集教養為文化資本主導的教養腳本，那麼在表中左側的四個依變項中（第二到五欄），學歷的解釋力應該要高過收入；而規劃外包為經濟資本主導的教養腳本，則在表中右側的四個依變項中（第六到九欄），收入的解釋力應該要高過學歷。

將以上推論對照表 8 參看，密集教養的相關變項大多符合預期，只有遷戶口稍有不同。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遷戶口本身需要較高的金錢花費，而對於文化資本高、經濟資本較低的家長來說，選擇了學區與學校後，用更簡便的掛戶口方式，至少除了最為競爭的少數學校外，一樣可以讓孩子進入明星國中就讀。同時，規劃外包的相關變項亦大多符合預期，只有才藝班稍有不同。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才藝班雖然與補習同樣需要較高的金錢花費，但其內容不乏琴棋書畫等，因而更受到高文化資本者青睞。

表 8 兩種教養腳本之教養實作變項檢驗

自變項	密集教養				規劃外包			
	教育期望	書籍展覽	藝術表演	遷戶口	學業聯繫	才藝班	出國遊學	教育存款
雙親高學歷	1.154***	.475***	.530***	.230***	.067	.887***	.638***	.152*
家庭高收入	.623***	.222***	.242**	.384***	.299***	.637***	.952***	.841***

註：N = 18,465。自變項之交互作用項以及所有控制變項均未呈現於表中，包含：高學歷 x 高收入、男性、獨生子女、排行老大、排行老么、地區、雙親婚姻、雙親省籍、雙親職業、雙親雇主、雙親主管。截距項亦未呈現於表中。

* $p < .05$, ** $p < .01$, *** $p < .001$.

⁸ 模型中排除認知能力的考量參第三章第四節。為便於比較，納入認知能力的模型結果見附錄 1。

在前表的基礎上，表 9 納入機制變項建構本研究的完整模型。首先觀察自變項，其中表 7 的主要發現仍然維持：第一欄發現收入對就讀私立學校的影響大過學歷，但其影響在高學歷者中大幅減弱；第二欄發現學歷對就讀明星國中的影響大過收入，且兩變項間沒有顯著之交互作用；第三欄比較明星國中相對於私立學校，發現高收入但學歷較低者傾向私立學校，而高學歷者不論其收入均大約同等地傾向明星國中。

接著討論機制變項，先觀察文化資本主導的教養腳本即密集教養之相關變項。可以看到，比較第一欄與第二欄，書籍展覽、藝術表演、遷戶口皆更能夠解釋就讀明星國中，符合研究假說；但教育期望儘管對解釋兩類學校均相當顯著，卻更能夠解釋就讀私立學校。聚焦在第三欄，直接對比明星國中相對於私立學校，藝術表演與遷戶口非常符合預期，顯著提升就讀明星國中的機率；但教育期望與預期方向相反，顯著提升就讀私立學校的機率。為何教育期望不符預期？前表的確證實高學歷相較於高收入更能夠解釋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然而，或許私立學校的篩選機制較能夠創造同質性較高的同儕群體，而使得高教育期望（希望子女未來取得大學以上的學歷）——相對於多元學習與適性發展的教育理念——更容易通往私立學校選擇。

再來觀察經濟資本主導的教養腳本即規劃外包之相關變項。此處的結果相當分明，比較第一欄與第二欄，四個變項即學業聯繫、才藝班、出國遊學、教育存款全都更能解釋就讀私立學校；甚至，這四個變項中只有才藝班在解釋就讀明星國中時有正向的顯著性。聚焦到第三欄，會發現四個變項全部都是顯著的負值，亦即會顯著提升就讀私立學校而非明星國中的機率。此一結果呼應文獻探討中以規劃外包描述對於新富階級教養實作的研究：擁有寬裕經濟資源與相對有限文化資本的家長，很可能更傾向於透過學校、教師或補習班等教育服務提供者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來促進孩子取得更高教育成就的機會。

表 9 家長教養腳本與學校選擇之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

	(1) 私立學校	(2) 明星國中	(2) - (1)
雙親高學歷	.427*** (.094)	.735*** (.074)	.308** (.098)
家庭高收入	.807*** (.083)	.449*** (.078)	-.359*** (.093)
高學歷 x 高收入	-.413** (.141)	-.057 (.121)	.356* (.144)
文化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			
教育期望	.689*** (.056)	.478*** (.044)	-.212*** (.064)
書籍展覽	.040 (.054)	.100* (.044)	.060 (.060)
藝術表演	-.150* (.076)	.184** (.059)	.335*** (.080)
遷戶口	.154** (.053)	.583*** (.042)	.430*** (.058)
經濟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			
學業聯繫	.223*** (.056)	-.107* (.047)	-.330*** (.062)
才藝班	.648*** (.066)	.400*** (.049)	-.248*** (.075)
出國遊學	.629*** (.084)	.116 (.080)	-.513*** (.090)
教育存款	.541*** (.061)	.032 (.044)	-.509*** (.068)
截距項	-5.161*** (.163)	-3.497*** (.118)	1.664*** (.183)
AIC	26396.7		

註：N = 18,465。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所有控制變項均未呈現於表中，包含：男性、獨生子女、排行老大、排行老么、地區、雙親婚姻、雙親省籍、雙親職業、雙親雇主、雙親主管。第三欄之係數差係將同模型之參照組從一般公校專換為私立學校而得，故係數等於明星國中減去私立學校，顯著度則以模型估計之標準誤計算。

* $p < .05$, ** $p < .01$, *** $p < .001$.

總結以上的討論，有較強的證據支持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說：「經濟資本主導的規劃外包，與學生就讀私立學校顯著正相關」；也有部分證據支持本研究的第五個假說：「文化資本主導的密集教養，與學生就讀明星國中顯著正相關」。回到最初討論教養腳本時的理論視角，當我們把學校選擇視為家長教養實作的一環，則從社會階級到教養腳本到學校類型的系列過程便可以放在同一個框架中得到解釋。

表 10 嘗試將這些發現與討論彙整並提出兩種教養腳本的理論假說。在中產階級家長之中，經濟資本佔比高於文化資本的家長，他們或許更重視教育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聯，對於孩子未來的路徑與目標有更明確的想像；他們擁有更加寬裕的經濟資源，但對教育場域的內部知識卻相對不足，於是可能在考慮與規劃後，更大比例地把教養託付給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此時，私立學校目標明確、同儕同質性高的特性，恰恰契合他們的教養腳本——本研究稱此種腳本為「規劃外包」。另一方面，文化資本佔比高於經濟資本的家長，他們或許更重視教養投入本身而花更多時間與孩子相處，並對於孩子未來的發展保持更開放的態度；他們未必擁有寬裕的經濟資源，但對教育場域的熟悉度與掌握度，讓他們可以篩選出更合於孩子需求的環境；此時，明星國中多元性高的特性，更契合於他們的教養腳本——本研究稱此種腳本為「密集教養」。當然，這兩種類型是一種概念上的區分，現實中出現的是更可能是混合的模式，且家長的偏好與策略也會依據孩子的特性、區域的特色等因素而呈現動態的發展。然而，本研究仍期許透過這樣的類型區分，能夠有助於分析與解釋社會階級與學校選擇之間的關聯。

表 10 教養腳本與學校選擇

	規劃外包 Concerted Outsourcing	密集教養 Intensive Parenting
資本	經濟資本佔比高於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佔比高於經濟資本
取向	目標導向	發展導向
稟賦	經濟資源寬裕	熟悉教育場域
策略	託付教育機構	尋找合適環境
偏好	私立學校	明星國中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探究在臺灣的國小升入國中之教育階段，家長的社會階級如何形塑其學校選擇。不同於量化實證研究常見的單向度、連續性階層變項，也不同於教養實作研究中常見的中產相對於勞工之階級二分，本研究援引 Bourdieu 之社會空間概念，同時使用資本總量與資本組成建構家長之社會階級。研究發現，相較於高經濟資本的家長更傾向於選擇私立學校，高文化資本的家長更傾向於選擇公立明星國中；至於經濟與文化資本均不高的家長，他們更多地集中在一般公立國中。這是本研究的第一個貢獻，即嘗試對於明星國中做出操作型定義，從而打破過往「誰選擇私立學校」所預設的公／私立二元劃分，進而通盤描繪出家長在一般公校、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三者所構成的學校選擇場域中，其最終做出的選擇如何受到自身的社會階級所形塑。

更進一步，本研究繼續開展社會階級的雙軸建構，從資本組成的不同，嘗試在過往研究描繪中產階級家長的「規劃栽培」教養腳本中，區分文化資本主導與經濟資本主導兩種次類型的教養腳本。本研究將文化資本主導的教養腳本稱為「密集教養」，表現在家長更多地花時間陪伴孩子、更大程度地考量孩子的適性發展；將經濟資本主導的教養腳本稱為「規劃外包」，表現在家長更加明確地為孩子規劃好生涯目標、更多地把教養託付給外部機構。研究發現，相較於密集教養之教養實作更能夠解釋家長讓孩子就讀明星國中，規劃外包之教養實作更能夠解釋家長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個貢獻，即嘗試把教養實作擺放入社會空間的不同位置，從而延伸過往中產階級相對於勞工階級的二元劃分，去勾勒中產階級內部的教養異質性可能如何受到結構性因素所形塑，進而串起從社會階級到教養腳本再到學校選擇的過程。

當然，現實中學校選擇的複雜樣態，並非本研究的統計模型所能夠完全捕捉——家長可能被動地選擇被分配到的學區學校、主動地選擇學區中複數公立學校的其中之一者、透過掛／遷戶口甚至購置房產選擇明星國中，或跳脫學區制度選擇私立學校。然而，統計模型能夠運用大型資料庫的全國性、分層比例代表性樣本，系統性地分析家長社會階級與其學校選擇之間的關聯。尤其，透過雙親高學歷與家庭高收入的交互作用項，本研究揭露至少在教育場域的行動中，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未必總是能夠被壓縮為單一的社經地位指標，而是各有其不同的影響邏輯與機制，從而導向不同的偏好與策略。這一點，對於其他教育領域的量化實證研究，或許有參考的價值。

回到本研究對於教育不平等的核心關懷：臺灣的國中教育階段，前端的篩選基本取決與家庭背景的較量、後端的成果卻有全國性的升學考試用以建立學校階序；那麼，國中階段的學校選擇，對於社會不平等的代間傳遞帶來什麼樣的理解？表面上，本研究通篇都是在探討具備社會優勢地位的那相對一小群人——不到 15% 的高學歷家庭以及同樣不到 15% 的高收入家庭——但卻也正是在對於這一小群人的選擇偏好與策略提出解釋後，我們得以反過來映照出那選擇能力受到更多局限的大多數人。從本研究的各種描述統計來看，私立學校與明星國中兩者具有相當程度的可比較性，而擁有約 70% 學生樣本的一般公校，不僅在家長背景與教養投入上與前兩者有一大段落差，其升學考試的成績分布之兩極化，更是很難不令人感到憂慮。這提醒我們，儘管公立國中的學區分發制度，相比高中或大學階段的升學考試制度，其篩選程度乍看沒那麼明顯，但公立國中之間的資源與成果落差，很可能非常巨大。成績篩選的確因為與家庭背景高度相關而為人所詬病，但成績篩選的缺乏也可能意味著家庭背景將佔據主導，導致特定的學校更加傾向招收到特定家庭背景的學生。並且，公立學校之間的差距不僅發生在城鄉之間，更同時發生在主動與被動選擇方案更加豐富的都市之內。

對於政策的建議，本研究並不認為這意味著家長的選擇必須受到更大的限制，而是必須意識到選擇的能力並不是等量地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因此更能夠回到公共教育的理念，更多地從學校學生的組成樣態、而非學校教學的成果表現，來觀察與思考教育不平等的問題與解方。同時，或許可以朝向更多元的篩選標準，讓競爭的軌道不會太多單一；同時也促進更彈性的選擇流動，讓選項的區分不再壁壘分明。最重要的是，也許我們必須投入心力思考隨機性在篩選與選擇中扮演的角色，因為任何一種制度，無論設計得如何完善，只要它的投入與產出之間存在確定性的關係，那條件更優渥者便始終更有能力去利用這個制度來達成自身的目的。最後，本研究雖然呼籲更加關注一般公校的現況，但並不意味著明星國中的存在是全然負面；因為，倘若少了這些頂層的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競爭，導致更多有選擇條件的家長湧入私教育形式，那麼對於公立教育的發展本身也未必是好事。

本研究亦存在限制。首先，對於明星國中的操作型定義，採取基測成績固然是重要的指標，但研究中所使用僅僅是學生樣本的基測成績，不能完全避免班級代表性、追蹤樣本流失等偏誤；若有全校性的升學考試成績，或許能更精確地建構變項。其次，公立學校之間的選擇相對複雜，可能是被動或主動選擇，這部分在變項操作中並

未能完全區隔；若能夠控制原居住區域所分發到的公立學校，或許能更進一步地區分不同的選擇樣態。最後，本研究雖然做出密集教養與規劃外包的概念分類，但分析上為了將教養實作儘量限縮在國小階段，而使得能使用的變項較為有限；理想上，若有一個大型資料庫在國小階段蒐集第一波資料，並在後續追蹤中觀察學生進入的不同學校類型，那麼對於教養腳本的實證檢驗，將能夠更加周延與完善。

未來更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至少有三。一來，可以繼續深化學校選擇的議題，把分析視野從公／私立學校之間、不同公立學校之間延伸到三種學校類型，再透過更深入的訪談或田野方法，有更深一層的洞見。二來，可以延伸兩種教養腳本的假說，在廣泛的中產階級家長中進一步研究其內部異質性，並嘗試從結構性的角度予以解釋。三來，可以從學校選擇的現象擴展到學校選擇的影響，例如探討就讀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其後續的教育成果是否存在差異；尤其 TEPS 本身是追蹤資料，從國中到高中階段，後續更有 TEPS-B 之樣本，為延伸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最後，TEPS 的資料蒐集發生在 2001 年，放在二十多年後的當前要如何詮釋？本文認為，恰恰是資料蒐集的時代背景，讓本研究的分析與推論更具有價值。首先，而在 TEPS 的時代背景中，家長並未經歷高等教育的大幅擴張以及就業模式的彈性解構，因此其學歷與收入可以成為相對穩定的測量指標，更直接地反映其社會階級。其次，且或許更重要的是，從 1990 年代教育選擇權擴展與另類教育發展到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國中或以下階段的學校選擇場域尤其趨向多元化與複雜化——家長所面臨的選擇已經不再是私立學校或者明星國中，還加入一系列「學校型態」的公／私立或公辦民營的實驗教育學校，以及一系列「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機構、團體共學或在家自學。這提醒我們反思：本研究資料所處的時代脈絡，學校選擇相對單純，就已經觀察到家長社會階級所造成的選擇分化；那麼，放在選擇複雜化的如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是否可能更被分入不同的教育選擇？而這個漸趨多元卻也可能漸趨分裂的教育選擇，將會對教育與社會不平等產生何種影響？

公共教育的理想往往令人嚮往：讓每個孩子不論家庭出身都同樣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而這教育中跨越不同出身背景的學習環境與友誼連帶，將有助於每個孩子的自我實現。我們不能夠忽視教育選擇所帶來的百花齊放，但同樣也不應該忽略教育選擇與社會平等之間所存在的張力。如此，方能夠逐步朝教育的理想前進。

參考文獻

- 吳昭儀，2011，《高雄市國民中學鄰近學校規模差距成因及其教育機會均等意涵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吳清山，1999，《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編號：NSC88-2413-H-133-001）。
- 李淑菁，2019，〈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家長「教育選擇權」範圍與內涵再思考〉。《文化研究季刊》166: 102-113。
- 周仁尹、曾春榮，2006，〈從弱勢族群的類型談教育選擇權及教育財政革新〉。《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2(3): 93-122。
- 林本炫，2006，〈我國私立大學的設立、經營和合併問題〉。《教育與社會研究》10: 65-92。
- 林忠樑、林佳慧，2014，〈學校特徵與空間距離對周邊房價之影響分析——以台北市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2(2): 215-271。
- 秦夢群，2014，〈美國特許學校經營與成效之研究〉。《教育資料與研究》115: 169-192。
- 張明輝、顏秀如，2005，〈英、紐、澳及瑞典中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教育研究月刊》135: 48-65。
- 張德銳，1998，〈教育選擇權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教育資料與研究》21: 1-7。
- 符碧真，1999，〈從美國教育券之實施論我國教育券政策〉。《教育研究集刊》42(1): 203-231。
- 莊奕琦、陳晏羚，2021，〈明星高中進入頂尖大學的學校特定效果分析〉。《經濟研究》57(1): 93-122。
- 許淑貞，2011，《臺北縣新莊區國民中學家長學校選擇因素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陳榮政，2021，〈我國實驗教育實徵研究之分析與展望〉。《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7(4): 69-96。
- 黃武雄，2013，《童年與解放衍本》。左岸文化。
- 黃毅志、巫有鎰，2011，〈明星國中，是橋樑，還是彩虹？以臺東縣國二生檢證 Coleman 的論點〉。《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1(1): 41-75。
- 楊馥綺，2012，《臺中市私立國民小學家長選校決策考量因素之研究》。臺中：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世閔、吳育偉，2004〈家長教育選擇權：教育公平與績效的雙刃劍〉。《國民教育研究學報》 12: 19-40。
- 盧靜怡，2022，《家長學校選擇權之研究：以越區就讀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欣妍，2015，《共同學區家長選校過程之探討——以台中市國小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級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30(1): 113-147。
- 駱明慶，2018，〈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經濟論文叢刊》 46(1): 47-95。
- 薛曉華，1996，《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臺北：前衛。
- 謝靜怡，2021，《家長選擇私立國中因素之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領導與政策碩士在職專班專業實務報告。
- 藍佩嘉，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 27: 97-140。
- 蘇國賢、喻維欣，2007，〈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臺灣社會學刊》 39: 1-63。
- Ball, Stephen J., Richard Bowe, and Sharon Gewirtz. 1995. "Circuits of Schooling: A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 in Social Class Context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3(1): 52-78.
- Ball, Stephen J., Richard Bowe, and Sharon Gewirtz. 1996. "School Choice, Social Class and Distinc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Advantage in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1(1): 89-112.
- Barone, Carlo, Florian R. Hertel, and Oscar Smallembroek. 2022. "The Rise of Income and the Demise of Class and Social Statu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asures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78: 100678.
- Berends, Mark. 2015. "Sociology and School Choice: What We Know After Two Decades of Charter School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159-180.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John Wiley.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Richardson. Greenwood.

- Bourdieu, Pierre. 2002.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Space." Pp. 267-275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Joseph Gerteis, James Moody, Steven Pfaff, and Indermohan Virk. Wiley Blackwell.
- Bowe, Richard, Stephen J. Ball, and Sharon Gewirtz. 1994. "'Parental Choice', Consumption and Social Theory: The Operation of Micro-Markets in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42(1): 38-52.
- Bryk, Anthony S., Valerie E. Lee, and Peter B. Holland. 1993. *Catholic Schools and the Common Goo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gess, Simon, Ellen Greaves, Anna Vignoles, and Deborah Wilson. 2015. "What Parents Want: School Preferences and School Choi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5: 1262-1289.
- Candipan, Jennifer. 2020. "Choosing Schools in Changing Places: Examining School Enrollment in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3(3): 215-237.
- Carbonaro, William, and Elizabeth Covay. 2010. "School Sector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in the Era of Standards Based Reform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3(2): 160-182.
- Chubb, John E., and Terry M. Moe. 1988. "Politics, Market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 1065-1087.
- Coleman, James, Thomas Hoffer, and Sally Kilgore. 1982. "Cognitive Outcomes in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5(2): 65-76.
- Craig, Lyn, Abigail Powell, and Ciara Smyth. 2014. "Towards Intensive Parenting?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Mothers' and Fathers' Time with Children 1992–2006."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 555-579.
- Elwert, Felix, and Christopher Winship. 2014. "Endogenous Selection Bias: The Problem of Conditioning on a Collider Variabl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 31-53.
-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1980.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Harcourt.
- Fuller, Bruce, and Richard Elmore, eds. 1996. *Who Chooses? Who Loses?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the Unequal Effects of School Choic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Goldthorpe, John H. 2000.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 Jaren R. 2021. "Sorting Schools: A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Charter School Identities and Stratifi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4(1): 43-64.
- Hanushek, Eric A., John F. Kain, Steven G. Rivkin, and Gregory F. Branch. 2007. "Charter School Quality and Parental Decision Making with School Choi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 823-848.
- Hoxby, Caroline M. 2003a. "School Choice and School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0: 9-65.

- Hoxby, Caroline M. 2003b. "School Choice and School Productivity. Could School Choice be a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 Pp. 287-342 in *The Economics of School Choice*, edited by Caroline M. Hox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ang, Min-Hsiung, and Taissa S. Hauser. 2010. "Tracking Persons from High School through Adult Life: Lessons from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EurAmerica* 40(2): 311-358.
- Jennings, Jennifer L. 2010. "School Choice or Schools' Choice? Managing in an Era of Accountabilit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3(3): 227-247.
- Lareau, Annette, and Elliot B. Weininger. 2003.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ory and Society* 32: 567-606.
- Lareau, Annette.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47-776.
- Lareau, Annette.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u, Shuning, and Michael W. Apple. 2016.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 Class Strategies,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 Essay Review of *School Choice in China—A Different Tale?*" *Educational Policy* 30(6): 940-955.
- Ma, Ying, and Ewan Wright. 2023. "Outsourced Concerted Cultivation: International Schooling and Educational Consult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2(3): 799-821.
- Marx, Karl, and Fredrik Engels.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Roksa, Josipa, and Daniel Potter. 2011. "Parent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4): 299-321.
- Sherman, Jennifer, and Elizabeth Harris. 2012. "Social Class and Parenting: Classic Debate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Sociology Compass* 6(1): 60-71.
- Shih, Yi-Ping. 2019. "Social Class and Cosmopolitan Parenting in Taiwanese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0(14) 1963-1989.
- Sunderman, Gail L. 2010. "Evidence of the Impact of School Reform on Systems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al Bureaucra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34(1): 226-253.
- Torche, Florencia. 2011. "Is a College Degree Still the Great Equalize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Levels of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3): 763-807.
- Treiman, Donal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eininger, Elliot B. 2005. "Foundations of Pierre Bourdieu's Class Analysis." Pp. 82-118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k Olin W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k Olin, and Bill Martin.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 1-29.
- Wright, Erik Olin, and Donmoon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weden, and Norwa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 85-102.
- Wright, Erik Olin. 2015. *Understanding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李屹譯，2022，〈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新北：群學。
- Wu, Xiaoxin. 2014. *School Choice in China: A Different Tale?* New York: Routledge.



附錄

附錄 1 家長教養腳本與學校選擇之多變項邏輯迴歸模型（含認知能力控制變項）

	(1) 私立學校	(2) 明星國中	(2) - (1)
雙親高學歷	.331*** (.095)	.657*** (.075)	.327*** (.098)
家庭高收入	.797*** (.084)	.443*** (.079)	-.355*** (.093)
高學歷 x 高收入	-.490*** (.142)	-.121 (.122)	.369* (.145)
文化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			
教育期望	.463*** (.058)	.300*** (.046)	-.162* (.065)
書籍展覽	-.012 (.055)	.054 (.045)	.065 (.060)
藝術表演	-.153* (.076)	.186** (.059)	.340*** (.080)
遷戶口	.130* (.054)	.557*** (.043)	.428*** (.058)
經濟資本主導之教養腳本			
學業聯繫	.272*** (.056)	-.065 (.048)	-.337*** (.063)
才藝班	.543*** (.067)	.318*** (.050)	-.226** (.076)
出國遊學	.662*** (.086)	.152 (.081)	-.510*** (.090)
教育存款	.533*** (.061)	.026 (.045)	-.507*** (.068)
截距項	-4.851*** (.165)	-3.239*** (.120)	1.612*** (.185)
AIC	25973.7		

註：N = 18,465。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參註 8 之說明，本表之用意為與表 9 對照參看，兩個模型唯一不同之處為：本表之模型在控制變項中並未排除認知能力。

* $p < .05$, ** $p < .01$, *** $p < .001$.